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11) 上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 郑和下西洋

15世纪初，正值明成祖朱棣在位，郑和作为明王朝的使臣，率领庞大的中国远洋船队，航行在碧波万顷的海洋上，出没在风波之中，战胜艰难险阻，接连7次远航西洋。他的游踪遍及印度洋、亚非两大洲的30几个国家和地区，沟通了中西交通的航道，为中国人民和南洋各友好邻邦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这在明初被传为一时“盛事”，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伟大的壮举。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无疑是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

明成祖用武力从他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手里夺得了皇位，有一件事总使他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他统率大军攻进皇宫，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那末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京城里传说纷纭，有的说建文帝并没有自杀，趁宫里起火混乱的时候，带着几个侍从太监从地道里逃出城外去了；别的地方传来的消息说建文帝到了什么地方，后来还做了和尚，说得有根有据，使明成祖不得不怀疑。他想，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他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人马，用朝廷的名义讨伐他，那就麻烦了。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派了心腹大臣，到各地去秘密查访建文帝的下落，但是又不好公开宣布，就借口说是求神仙。这一找，就找了二三十年，仍是下落不明。这让明成祖很苦恼，陆地上看来是找不着了。

明成祖又想，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呢？那时候，我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明成祖心想，派人到海外去宣扬国威，跟外国人做点生意，采购一些珠宝，顺便探听一下建文帝的消息，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当时，朱元璋将皇位传给孙子朱允炆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很支持，明成祖是从他侄儿手中夺得皇位的，所以在刚即位的时候，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他也总觉得这是一桩使人焦虑不安的心事。刘基的儿子刘璟，以前与明成祖关系不错，曾经一块下过棋，谈过天，但自从成祖即位后一直没来道贺，他派人去请刘璟，刘璟推说有病不来。明成祖很生气，就把刘抓来，问他：“皇帝召你为什么不来？”刘璟回答说：“建文帝死了，哪有皇帝？”明成祖说：“我不是皇帝吗？”刘璟说：“殿下自称皇帝，其实您是篡位的人，百世以后也逃不了一个‘篡’字。”刘璟不承认明成祖是皇帝，所以还像以前一样称他殿下。明成祖一听刘璟说他篡位，勃然大怒，命令把刘璟关起来。刘在狱中上吊自杀了。明成祖还是余怒未消，命令将刘璟的家人也抓起来关进监狱。

刘璟虽然死了，可是明成祖耳边总是响着刘璟说的那个篡权的事，心里很不舒服。他想，我若能干出一番事业，证明比建文帝强，别人就没话说了。若是外国都来朝贡，尊我为天下“共主”，宣场了国威，提高了我的威信，大臣们就服气了。可是怎么才能让各国来朝贡呢？就得派人去……于是明成祖想到了才能出众的三宝太监郑和。应该让他代表我大明帝国去大海以外的国家帮我完成这一件事。明成祖这一想法存在了很久。只是由于当时国家刚刚安定，他的皇帝位置还没完全巩固，所以并没有马上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从成祖当皇帝的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准备各种必要的航海物资，并且让郑和挑选合适的随从人员，一旦条件成熟，马上扬帆远航。

另外，成祖还做了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如在翰林院开设“八馆”，训练、培养通晓外国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才；在福建沿海命令修造海船；还注意选拔忠于职守，才貌出众，能够执行外交政策的各方面人才。

在以后多达 7 次的航海活动中，这些人才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另一方面，当时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明成祖大规模开展航海活动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且产生重大推动作用。明初，经过洪武时期采取的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以后，人口增加了，耕地面积扩大了，粮食等重要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有了提高。手工业也比以前发达，如矿冶业中的冶铁，炼铁炉高 1 丈 2 尺，每炉能容纳 2000 多斤矿砂，铁的质量很高，这有利于建造大海船。在江南，纺纱、织布成了农家的普遍副业，有的甚而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造船业发展更快，在宋、元两代的基础上，在规模和制作工艺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当时的远航海船，船体巨大而坚固，为郑和出使西洋而专门建造的海船，最大的船长 44 丈，阔 18 丈，可以乘载五六百至一千人。这种船航行起来很平稳，可以抵御大风大浪的冲击。

社会经济的繁荣，明政府刮取了大量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物质财富，有能力承担大规模外事活动的巨大开支。生产的发展，不仅使开展对外贸易成为可能，而且也是国家的迫切需要，因为国内有可供出口的物资，如绸缎、瓷器、铁器、土特产及手工艺品等；同时也需要进口本国不出产的必需品，如香料、染料、胡椒等；而那些王侯贵族、地主豪绅，更希望通过对外贸易换取一些满足其奢侈生活欲望的消费品。他们对南洋各国的珊瑚、珍珠和工艺品非常喜爱，不惜花费巨资来换取这些东西。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阳人。他出生于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祖、父先后都曾到过麦加圣地朝圣，被尊称为“哈只”（意即到过圣地巡礼的人。）郑和的祖父和父亲生活在元末明初。那时候，由于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阿拉伯航海贸易的发达，西起印度洋沿岸各国，东到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信奉伊斯兰教。而印度半岛上的一些国家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榜葛刺（今孟加拉）、真腊（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南部）、暹罗（今泰国）等国家则信仰佛教。和这些国家交往，对于既是伊斯兰教徒又是佛门弟子的郑和说来，是很方便的。他对伊斯兰教非常了解，平时生活中也一般遵循教规教义的要求。这些都受到他父亲的影响。郑和的父亲是个刚直笃信的回教徒，在家常对孩儿们讲述当年飘洋过海到麦加朝圣的故事。郑和经常津津有味地倾听着各种各样新奇的轶闻故事，以及那些勇敢冒险的航海经历，他特别神往传说中的那神秘的海洋和异国的风光，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能继承先辈的勇敢冒险精神，航行在碧波万顷的海洋上，施展出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为国为民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朱元璋派沐英等出兵云南，平定了西南。在战火纷飞之中，郑和的父亲不幸病逝，年仅 12 岁的他也被明军俘获至军营，以后又辗转送到朱元璋第四子朱棣的身边充当贴身太监。“靖难之役”后，朱棣起兵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这时郑和跟随朱棣在军中参与战事，他能够给朱棣提出一些很及时的建议，为朱棣夺取皇位建立了汗马功劳，得到燕王朱棣的宠信。朱棣即皇帝位之后，郑和便被提拔为内官兼太监。明成祖朱棣对他的赏识和重用，使郑和有显露才华的机会；在“靖难之役”的征战中，他又经受了军事锻炼，增长了组织、指挥战斗的才干，这些都为他日后远航西洋，指挥庞大船队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朝时候已经有“识宝回回”的说法，是说回族人善于鉴赏宝物，会做买卖。郑和从祖父和父亲讲述的回族航海经商的故事中受到启发，也懂得一些进行海外贸易的知识。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考查，郑和确实是完成明成

祖联络各国、发展海外贸易的最好人选。

其实朱棣早就有意让郑和带队远航，只是条件还没有成熟。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朱棣终于下定决心派他作为出使西洋各国的外交使节。他认为郑和勇敢、机灵、有胆略，能够不辱使命。而且郑和一家祖辈信奉回教，郑和本人既是回教徒，又信奉佛教，有利于和西洋各地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交往。郑和又是宫廷内官兼太监，了解皇帝和妃子们的各种爱好和需要，更可以兼任为皇廷向海外采购奇珍异宝的使命。他在出发前就已经成为明成祖朱棣最为信赖的近臣了。

郑和有着敢于进行探险的勇敢精神，所以，他欣然受命，积极筹办远航的事情。在朱棣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大船 62 艘，每只大船都可以装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连同中小船只，合计有 200 多艘。使团的人员多至 2000 多人，除负责保卫的军卒之外，还有众多的水手。船上有各种专业人员，如火长（负责罗针）、碇手（司舵）、军匠、民匠（负责修理弓箭、器械），还有担任翻译的“通事”，办理交涉事务的“行人”，以及医生、伙伕、书算手等等。每艘船上装载着备用的粮食、淡水、盐、茶、酒等日用品，以及作为贸易交换用的铜钱、绸缎、织锦、瓷器、铁器等各色货物。郑和把这些船都编上号，按大小不同的船型排好先后航行的程序，并对航行中可能遇到的事情都仔细考虑了一遍。一切都准备得充分而完备，单等着成祖皇帝一声令下，便可扬帆远航。

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六月，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朝霞和波光相辉映，刘家港上下笙鼓齐鸣，浪涛拍岸。郑和统率的远航船队首航开始，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启程，先沿海岸线航行至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的助力，由闽江口五虎门扬帆出洋，驰向浩瀚的海洋。就这样，中外航海史上最壮丽的一章被三宝太监揭开了！

为了便于管理，船队编有名号，船号如“清和”、“安济”、“清远”……，船名有“大八橹”、“二八橹”之类。当时的船师，多半来自素负航海经验的闽、浙、粤沿海的船民，军卒也从东南沿海卫所征调。象这样分工严密，规模宏大，人员众多的庞大船队，在中国航海史上是空前的，在 15 世纪初期世界航运事业上也是首屈一指。它凝聚着中国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也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

船队一路航行顺利，首航直抵占城即今天的越南，然后到爪哇的苏鲁马益（今泗水），再到苏门答腊岛南部的旧港。以后又由旧港到马来亚半岛西岸的满刺加（即马六甲）。由于当时风向不稳定，加上首航时间太长，郑和就在这里建立据点修造仓库，驻扎兵营，从事休整。然后由此出发，向西北到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以后称“亚齐”），又西航至锡兰山（即锡兰岛），然后绕印度半岛南端而北，到达葛兰（今印度西南沿海阿勒皮一带）、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今印度西南沿海科泽科德一带）等地，最后在永乐五年（公元 1407 年）秋季，顺利返航回到中国。成祖很高兴，亲自召见郑和，寻问沿途的所见所闻；对郑和的功绩大加赞赏，赐予他和随行的其他人员许多金银布帛。

郑和这一次出使，的确起到了很好的外交作用。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遇到几次惊涛骇浪，但是船上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船队从没出过事。只是在船队回国途经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亏得郑和沉着冷静，胆识过

人，才顺利地解决了这件麻烦事。

原来，旧港地方有个海盗头目，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听到郑和船队带着大批宝物经过，分外眼红，就和同伙计议，表面上准备迎接，背地里计划趁郑和不防备，就动手抢劫，然后乘快船迅速逃离。

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卿得知，他偷偷地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提醒他早一点严加防范。

郑和并未着急，心想，我手下有2万兵士，还怕你小小海盗？既然你要来偷袭，就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也算是为民除害了。他命令把大船散开，在旧港港口停泊下来，并命令船上的兵士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郑和的士兵都是些经过挑选的精兵强将，他们的战斗力非常强，小小几个海盗，的确不是他们的对手。

夜深的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直驶港口，准备偷袭。正准备停船上岸的时候，只听到郑和座船上一声火炮响，周围的大船都驶拢来，把陈祖义的海盗船围住。明军人多势大，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兵士丢下火把，把海盗船烧着了。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他本想趁黑夜偷袭，捞一把不义之财，没想到郑和早有准备，财宝还没见着个影子，自己先被抓了起来。

郑和把陈祖义捆绑了起来，押回中国。到了京城，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会见了明成祖，送上大批珍贵的礼物。明成祖见郑和把出使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又平定了一次海盗偷袭，特别高兴，接连把郑和的官职提了好几级，庆幸当初选郑和作远航船队的首领，确实是选对了。

后来，明成祖相信建文帝确实是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但是出使海外的事，既能提高国家的威望，又能促进跟西洋各国的交往、加强海外贸易，所以他决定继续派郑和出使海外各国。

从此以后，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先后29年，郑和率领他的庞大船队，先后7次下西洋。行踪遍及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非洲东海岸等30几个国家和地区，即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刺加、彭亨（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巫里（以上均属今天的印尼）、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榜葛刺（孟加拉）、忽鲁谟斯（伊朗）、祖法儿（佐法儿）、阿丹（红海的亚丁，属也门人民共和国）、比刺、竹步不喇哇（属索马里）、木骨都束（即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麻林（即麻林地，属肯尼亚）、天方（即麦加，属沙特阿拉伯）等。其航线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象这样遥远的航程，如果没有坚实的船只，先进的导航技术，充足的物资准备，以及丰富的航海技术，是很难安全顺利地完成的。

郑和最后一次航行是在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此次航程最远，经历的国家最多。船队从南京下关的龙湾出航，一路沿海岸线南行，到达广东境内后，再向西行。到达古里后，又派出小队到麦加圣地朝圣，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回国。这在世界航海史上，比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瓦斯科·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当时郑和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用在了航海事业上。

郑和在多次下“西洋”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的风险，只是由于他的勇

敢机智，指挥有方，以及全体人员的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每当遇到意外事故时，才能化险为夷，战胜危难而获得成功。最为惊险的除第一次陈祖义偷袭之外，还有第三次与锡兰国王的较量。

在印度半岛东南，有个大岛叫锡兰山，是当时印度洋东西航路上的必经之地。永乐七年（公元 1409 年）二月，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归国途中路过这里时，代表明朝政府向锡兰的一座寺庙赠送很多金银供器、织金宝幡和香油、蜡烛、檀香等礼物，还为此立了一座碑，这就是后来 1910 年在斯里兰卡高尔市出土的“郑和锡兰碑”。没想到，就在同一年，当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路过这里时，国王见郑和船队财物很多，起了贪心，想谋害郑和，劫掠船队。郑和看到情况不对，赶忙率领船队离开了。当郑和回航又经过锡兰时，国王装作很热情的样子，把郑和骗进城中，让王子向郑和勒索财宝，同时派 5 万人劫掠郑和船队。郑和发觉之后，立即赶回船队，可道路已被截断。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郑和不得已率 2000 人出其不意攻占王宫，活捉了锡兰国王，锡兰王子见状，赶忙投降。郑和回到船队后，把国王带回南京，交给明成祖处理，明成祖后来把他放了回去。

永乐十三年，郑和第四次出使西洋，回航时路过苏门答刺国（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亚齐）。他送给国王大量礼物，可是就在当天夜晚，发生了有人抢劫船队的事。郑和赶忙派人查访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苏门答刺国的西边有个那孤儿国，因为这个国家的人脸上都刺有花纹，又被称作花面国。苏门答刺国与花面国一直不和，永乐六年（公元 1408 年），这两国打了一仗，苏门答刺国王中箭身亡。王子当时年龄还小，没法报仇，王后对国人说：“谁能领兵打败花面国，替先王报仇，我就嫁给他，并让他当国王。”一个渔翁自告奋勇，领着军队打败花面国，杀了花面国王。渔翁娶了王后，当了苏门答刺国王。老国王的儿子长大之后，领一帮人杀了渔翁，登上王位。这就是郑和赠给礼品的国王。渔翁国王有个儿子叫苏干刺，想夺王位，被新国王打败，逃到叫邻山的地方，自立一寨。他见郑和没有送他礼物，非常生气，率领数万军队，袭击郑和船队。郑和与新国王取得联系，请他派军队助战。在苏门答刺军队密切配合下，郑和指挥将士英勇奋战，把苏干刺的军队杀得大败，并且活捉了苏干刺，把他押回北京杀了。新国王非常感激郑和，认为郑和是自己得以坐稳王位的大恩人。

郑和三次用兵，都是为了自卫，不得已而为之。带兵是为了保卫船队，消灭海盗，保障各国通商和友好往来，因此深受各国欢迎。每次出使外国都受到隆重接待；每次回国，都带回来许多外国的使者。

郑和多次出使“西洋”，和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传播了友谊的种子，架起了通商的桥梁。有不少国家派遣使者随同郑和来到中国，把他们随船运来的土产作为贡品，和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明朝也很欢迎这种贸易活动。有的国家的国王亲自到中国访问，如满刺加国君拜里迷苏刺祖孙三代都到过南京，并多次派遣贡使来华进行贸易。在与中国长期而频繁的接触过程中，他们学到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把这些义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通过郑和连续不断的航行活动，中国和南洋的航路畅通了，对外贸易发展了，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也增强了，出国的人比以往更多。他们飘洋过海，散居在南洋各地，是南洋群岛的拓荒者，为当地的开发和繁荣流淌了血与汗。同样的，来中国访问、经商的外国人也络绎不绝。今天定居在东南亚各国的

华人，有许多都是当时随郑和船队飘洋过海到那儿的华人的子孙后代。

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公元 1405 至 1433 年），郑和 7 次率船队远航，28 年的航海活动，耗尽了他的心血。宣德八年三月中旬（公元 1433 年 4 月上旬），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在最后一次航行的归途中，病死在印度半岛西南部的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

郑和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航海家，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为远航的事操心，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航海事业，在与惊涛骇浪的搏击中，表现出不畏艰险的英雄本色和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在长期的航海生涯中，他和众多的助手不断总结经验，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庞大的船队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他们通过多次实践，细心的观察，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潮汛、季风、洋流等自然规律。白天，他们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以“牵星术”定向测距，经过长年积累、记录，凡是航路、开船时间、停泊处处、暗礁、浅滩、急流等等，他们全都一丝不苟地加以标志、说明、绘图，终至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航海图》和《鍼位图》，可惜后一部书已经失传，这是我国于 15 世纪初，对世界海洋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从此之后，中国和南亚各国的航海事业发展得很快。

郑和 7 次远航，也培养出一批杰出的航海家，如当时随从郑和出洋，担任“通事官”（即翻译）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 3 人，也都留下了记载有关航行经过，所到诸国的风土人情、山川道里以及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等方面的著作。费信撰写了《星槎胜览》，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撰《西洋番国志》。这些作品早已被翻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广为流传，成为中外学者学习、研究航海知识、航运历史，以及“西洋”各国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他们当时航行到达的许多国家，如今都从这几部书中发掘本国的历史。郑和及其随员在文化传播方面也做出巨大贡献。

郑和作为明王朝派遣出洋的使者，他肩负着结好友邦的重要使命。所以，他每到一地，很重视了解风土民情，做到“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并且拜会当地的酋长、国王，同他们互赠礼品，向其表明通商友好的诚意。因此，郑和一行所到之处，也受到友好、热情的接待。当地人把郑和看作天朝来的贵客，给他们带来了珍贵的货物和深厚的友谊。如郑和初次航行到占城时，当地国王率领大小首领盛装举行隆重的礼节，迎接郑和率领的船队的到来。当郑和的随行人员侯显到达榜葛拉（今孟加拉）时，国王特地选派 1000 多人到察地港远迎，然后又用大象接载到皇宫，由国王亲自主持欢迎仪式，双方互赠礼物，国王还特意设盛宴款待中国客人。又如在第四次下“西洋”时（公元 1416—1419 年），郑和来到非洲的木骨都束（即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会见了该国国王，受到国王的宴请。郑和把明朝皇帝送给国王和王妃的中国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交给了国王。国王十分喜悦，在郑和启程返国时，特地派了使臣随船访问中国，并且赠送明朝皇帝许多非洲特产，如“马哈鲁”（即长颈鹿，中国古代称为麒麟）、“花福录”（即斑马）、“千里驼鸡”（即鸵鸟）等，作为通贡贸易的礼物。

郑和每次出洋，还把带去的大量金银、钱币、丝绸、瓷器等，用来和当地人民互通有无，平等贸易。通过贸易交流，船队每次出使归来，都带回了“西洋”各地土特产和手工艺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宝石等，乃至各种珍禽异兽如狮子、鸵鸟等，所以当时人们把郑和的船队称为“宝船”。

郑和船队7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赤道以南的麻林地（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和慢八撒（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港），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它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是打开从中国到东非航道的第一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他在世界航海史上立下了一座丰碑，是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先导者。可惜自郑和去世后，明朝政府开始走下坡路，不再派使团远航出使西洋各国。

郑和创建的业绩，在他身后虽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但他生前所做的重大贡献，却使人们永远铭记心中，思慕怀念。人们为了纪念他，凡是当年游览过的山水，宝船停泊的港口，军队驻守的地方，都作为名胜古迹、游览胜地。在国内，有南京的龙湾和天妃宫、静海寺，太仓的刘家港，福建泉州的行香碑记，长乐的十里洋街、三宝岩、天妃宫……；在国外，在今日的南洋诸岛，著名的有马六甲的三宝城、三宝井，印尼爪哇的重要商埠三宝垅，泰国的三宝庙和三宝塔；在锡兰，至今还屹立着当年郑和树立的布施佛寺碑。这些名胜古迹都以“三宝”命名，为的是表示对这位和平使者、伟大的航海家三宝太监永恒的纪念。这也是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 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

明朝自从嘉靖、万历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激烈的矛盾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不过，嘉靖朝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门户。到了万历朝，各派官僚集团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利害冲突发展到了高峰，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更为尖锐复杂，党争也就更加激烈。他们联帮结派，势同水火，激烈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覆亡时为止。

大约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起，朝臣中的两派斗争进一步激烈，逐渐各自形成了不同名目的党。另外，角斗的参加者中，还有越来越多的被罢免的官吏，这也是当时双方斗争较前更为激烈的一个反映。两派斗争一般分为东林党和邪党。

东林党是正直派的名称，这一名称的取得与顾宪成有密切关系。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生。万历八年考中进士，进入吏部当官。他一进入仕途，即对朝政极为关心。顾宪成不仅关心朝政，而且为人正直，敢言直谏，对于权贵超出规范任意行事作恶多端的做法不肯容忍。万历九年（1581年）六月，首辅张居正生病，朝廷亲自出面为他到泰山祈神保佑，顾宪成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国家规定，坚决不同意，当面向张居正陈述反对态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吏部尚书孙 把有关系的官统统裁去，顾宪成当时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顾宪成不阿权贵，因而仕途很不顺利。万历十五年（1587年），被贬为桂阳州判官。不久，回京重新到吏部任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更由吏部文选郎中降杂职，很快又被革职为民。他第二次被降谪，是因推举阁臣得罪了明神宗。当时首辅王锡爵将要退政，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侍郎越参鲁、盛讷等将明神宗讨厌的王家屏推举为首辅候选人。加之明神宗对名单中的其他一些人也有看法，因而对顾宪成很不满意，下令重新推选。于是吏部另将有关人员写入名单推上。明神宗看后仍不满意，特别是发现王家屏仍然列名其中，更为生气。顾宪成又被降为杂职，接着又被削职为民。

顾宪成罢官后家居。家乡原有东林书院，乃宋朝理学家杨时讲学的地方。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了东林书院，并与高攀龙等人一起在这儿讲学。他们都是为人正直、遭打击排挤而被罢官的人。顾宪成与其共同“讲学”者，都是虽处逆境，但不忘关心朝政大事的人，这个书院里的一副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评论朝政、评价政治人物。这样一来，使东林书院形成一个舆论中心，对朝臣发生不小的影响，许多当朝官员都听从他们的意见。由此，东林书院的名气越来越大。朝廷内外的正直的一派士大夫，便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为了与东林党相抗衡，邪派势力则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这是以沈一贯的追随者为基础，逐步扩大成员而形成的。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城人，字嘉宾，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中举，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善于写作，许多重要诏令都是他起草的。昆党首领为顾天峻，昆山人，字升伯，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进士，授编

修的官职。汤宾尹和顾于峻都爱议论“天下安危大计”，他们各自拉拢党羽爪牙，干预时政，被分别称为宣党和昆党。另外的齐、楚、浙三党是科道官按籍贯形成的集团。宣、昆、齐、楚、浙这些政治小集团虽然彼此之间时常也有些矛盾斗争，但他们在对待东林党的态度上都是一致的，都卖力地攻击东林党人，把东林党看成自己的大敌。

两派形成不同名目的集团之后，相互间以空前的激烈程度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其中重要的包括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韩敬科场案、李朴事件等。之后还有三案之争。到明末，魏忠贤专政以后，邪党投靠魏忠贤，继续打击东林党。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曾任山东司道，当官的时候很有政绩。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当时矿监税使横行霸道。李三才与之作斗争。官衔屡加至户部尚书。另外，当沈一贯当权之时，他还经常上疏攻击沈一贯的错误，因此，朝中的邪派官僚对他“恨之刺骨”，而比较正直的士大夫对他多起好感。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与李三才交往颇多。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8月，顾宪成曾专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讨政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李三才曾上疏建议朝廷重新启用那些曾被罢免的官员。其意图就是为了给顾宪成等人创造东山再起的机会。李三才为什么能得到顾宪成的信任呢？其原因之一即在于他善于玩弄手腕。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发生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当时李三才在淮任职已久，屡次被提名出任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不久又建议他入内阁掌握朝政。这使邪恶派的官僚甚为不快，而且他们推测尚对李三才加以攻击，那么东林党肯定会救他，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于是便上疏弹劾李三才，挑起了一场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浙江定海人、沈一贯的亲戚、工部郎中邵辅忠。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二月，他参论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是个贪婪而虚伪的小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正月，其同伙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上疏继续攻击李三才。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等相继上疏为李三才辩。大学士叶向高上言：李三才已经呆在家里等着发落，为漕政计，应速走去留。对于上述奏疏，明神宗一概不作答。不久，邪恶派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等，又连章弹劾李三才；而与之相对立的给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则针锋相对地为李三才辩护。在朝中争论不下的时候，身居家乡的顾宪成也参加了进来。他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又写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可惜顾宪成这回帮了个倒忙，邪派官员认为朝政不能由罢了官的顾宪成所左右，李三才只好自己辞职。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加深了士大夫中两派党争的对立情绪，从此南北党争，更加难以解决了。

党争的尖锐化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的。

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朱常洵。明神宗喜欢朱常洵想立他为太子。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这个问题争了15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才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把这一场争吵叫做“争

国本”。在激烈的斗争中，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排挤打击对立派的手段。所谓“京察”，原是明朝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规定6年考核1次。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而，各党都恨不能置对方于被罢官的境地。京察时主持察典的是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御史和吏部文选郎中，因此，这几个职位就成为各党激烈争夺的中心。

万历三十三年（1605），东林党人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浙党官员钱梦、钟兆斗等受贬谪。浙党首领，首辅沈一贯大怒，搬出明神宗，深责主持的官员，并扣留京察的奏疏不发。万历三十九年（1611），秦党孙丕扬主持北京京察，东林党的官员与他联合，借以驱逐齐、楚、浙、宣、昆诸党，而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东林党人大受斥逐。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主持京察，为报复三十九年的京察，东林党人一时被驱逐得几乎一干二净。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察，则又反过来大事报复。京察就这样成了各党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好机会。

万历末年，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东林党人目睹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东林党首领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翰林院检讨姚希孟，也是东林党人，反对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一样的危险。明神宗贪婪成性，为了搜刮财赋，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万一天下大乱，到那时，陛下凄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

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反映了工商业者要求限制封建掠夺的呼声，对资本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东林党人的这些言行和政治见解，虽然赢得社会广大阶层的同情和支持，但却不能为腐朽昏愤的皇帝所采纳，而且引起了反动官僚集团的憎恶。所以，不仅他们的改革希望象梦幻一样地破灭，还招来了日后宦官勾结反对派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

明末党争的焦点除上面所说的争“国本”外，还有“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三案都是围绕争夺皇位继承权开展的。是朱常洵为争得太子地位进行的最后努力。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檐下才被内侍擒住。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是个疯子，后来又经两浙党官员审问，结果和初审完全一样。于是，便准备按疯颠结案。当时朝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均怀疑是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主使张差谋害太子，为朱常洵夺取太子地位。而且浙党魁首方从哲向来交通外戚以

巩固地位，因而对浙党官员的两次审讯均表怀疑。

刑部主事王之采私下探询张差的口气，查出张差系受人指使，从蓟州来到京城，被一太监带进宫作案的。王之采把这些情况报告明神宗，并说，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举行朝审或会审。浙党攻击王之采胡说，坚持张差是疯颠，要求把张差立即处决。后来，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举行会审，张差供认“太监庞保、刘成二人指使他打进慈庆宫，并对他说：“打死‘小爷’（宫中太监称太子为小爷），有吃有穿”。庞、刘二人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至此，真相大白。神宗恐怕进一步追查会牵涉到郑贵妃，下令把张差凌迟处死，把庞保、刘成秘密处决于内廷。这一案件便草草结案，这就是所谓“挺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承帝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已经有妃子、宫女多人，朱常洛当皇帝后，郑贵妃怕他记前恨，又选了四个美女进献，以此来讨好他。这下子，美女们便要了他的命。光宗溺于女色，即位没几天便得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日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觉得较为舒服。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把它服了，睡到第二天凌晨死去，只当29天的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此即为“红丸案。”

光宗之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而首辅方从哲却用光宗遗诏的名义，赞扬李可灼为光宗治病有功，拟赏李可灼银五十两。于是，群情大哗，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方从哲才把赏银改为罚俸一年。但是纠弹的奏章还是接二连三地送上来，指责内医崔文升系郑贵妃心腹，故意给光宗用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进红丸致光宗死亡，罪不容诛；而这些罪行都是方从哲指使干的，认为方从哲有十大罪、三可杀。方从哲在众官员的指责下，只好辞官。天启二年（1622），东林党人礼部尚书孙慎行又追论李可灼和方从哲，指斥方从哲是谋杀皇上的千古罪人。大多数官员都要求办方从哲的罪。方从哲上疏力辩，同党官员也极力为他辩护。争了好长一阵子，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还是无法官复原职。光宗生前宠爱的一位选侍西李，在光宗未死时曾谋取皇后的地位，光宗死后，又企图借皇长子朱由校年少（仅16岁）之便，掌握大权。她要下面的官员把奏章先交给她看，然后才转给皇长子。而且，光宗死后，她还住在乾清宫里，无意搬出。本来，按照封建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配住乾清宫。光宗死后，照规矩她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因此，一些大臣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九月初二日）就合疏请西李移宫。御史左光斗的言论最为激烈，他说，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而让西李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则天专权的灾难将复见于今日。奏疏上去后，西李还是没有移宫的意思。初五日，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在群臣的催促下，西李不得不搬出乾清宫，移居仁寿殿。此即为“移宫案”。

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书责备力促移宫的杨、左，说西李系光宗遗爱，光宗尸骨未寒，就对她限时驱逼，未免太过分了。于是，两派官员又围绕着移宫的是非展开了激烈争吵。后来，新登基的熹宗（即皇长子朱由校）传出一道谕旨，痛数西李的几条罪状，包括威挟邀封，控制臣下上奏的文书，企图垂帘听政，凌虐、逼害嘉宗生母致死等，下令叫西李搬出仁寿

殿，并且指责为西李说话的官员是“党庇”，于是，争吵才稍为缓和。

“国本”以及“三案”的争议，其斗争的实质，乃是不同派系的官僚集团为了在最高统治阶层寻找自己的靠山，争取最高统治者的倚重和宠幸，借以捞取政治资本，谋求自身的权力和地位。“三案”发生的当时，东林党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到后来魏忠贤的阉党专政时，“三案”又被彻底翻过去，成了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的口实。

正直派东林党围绕三案对邪恶派官僚的弹劾，从其基本内容讲，基本符合实际，但也有一些人将一些无法落实的罪状说成确凿事实。另外，其态度也显得过分激烈，许多人是抱着与对手誓不两立的严厉态度。正直派官吏的这些表现，无疑有些感情用事。双方几十年的角斗，相互间形成了严重的仇恨情绪，万历末年正直派官吏受到残酷打击的经历，更使之对此耿耿于怀；现在正直派官吏翻过身来了，他们便很易于怀着百倍的仇恨，向对方发泄胸中积存已久的怒火。然而权衡当时的大局，正直派官吏的这些作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如果这时他们不把自己的相当多的精力用在对历史问题的追究，而且态度宽恕一些，那么，他们就可有更多的精力去改良当时的政治，与对立面的紧张关系就会得到缓和，这将对巩固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极有帮助。但他们实际上却是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用了相当多的精力去追论三案，报复政敌。这便无精力在改良政治上较多地有所作为，也使邪恶派与之仇恨更深，门户之争不仅不能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当时腐朽的宦官魏忠贤集团恰好正在兴起，于是到天启四年（1624年）后，它终于代替正直派官吏，而在朝廷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将朝政掌握在自己手中。

东林党在万历朝不受重用，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和光宗在不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后，其命运才有了转机。光宗临终之时，李涟以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受顾命。扶立熹宗朱由校，自此东林党人受到重用。天启初年，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把持。东林权势，盛极一时。

但是，当政后的东林党并没有什么建树，他们毕竟只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地主阶级中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没有提出，也提不出一个救世良方。此时的东林党人只是忙于起用大批前期受贬的党人；再则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诸党。并且，这些被誉为正人君子的东林党偏狭傲慢，不能容人，凡是不合自己口味的都视为异党，加以排斥。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壮大东林党自己的势力，反而迫使一些本非死对头的官员投靠正在发迹的魏忠贤。

熹宗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他即位后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暧昧关系的惜薪司太监李进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让他恢复魏姓，赐名忠贤。

原来，魏忠贤乃河北肃宁县人，是个二流子，因赌博输了钱，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混入宫中充当太监。后来和客氏搭上关系，得到熹宗的宠幸和信任。

魏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能当秉笔太监，当上秉笔太监后，就利用王体乾和李永贞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效劳。他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和客氏狼狈为奸，宫中谁也不敢和他作对。王体乾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在魏忠贤之上，也得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使唤。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

客氏与魏忠贤之受重用和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不是由于立过战功，也不是因为具有治国才能，完全是由于宠幸所致。因此，当时的东林党正直派官吏对此不予支持，相反，一有机会即加反对，绝不与他们拉拢关系。

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朱由校正式举行婚礼，立张氏为皇后，刘一燝即借机上言，请朱由校把客氏逐出皇宫。由于客氏出宫后，朱由校“思念流涕，茶饭不思，不久便重新接客氏进宫。赵南星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魏忠贤想与他拉关系。赵南星却拒绝接受。与正直派官吏不同，喜爱投机的邪恶派官僚对于客氏、魏忠贤的态度，则往往是尽量向之献媚，投其所好，以便寻求靠山，走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昆山入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顾秉谦，与阴险狡猾的南乐人南京礼部侍郎魏广微，在这时巴结归附魏忠贤，遂于天启三年（1623年）春当上了大学士。

由于正直派官吏及邪恶派官僚对客氏及魏忠贤的态度截然相反，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造成魏忠贤一开始就与邪恶派官僚结合在一起，而且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投奔魏忠贤的邪恶派官僚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腐朽的政治集团。由于这个集团的首脑魏忠贤是个太监，所以投奔在他周围的邪恶派官僚被称为阉党。魏忠贤集团从其形成之日起，就不断找机会向正直派官吏发动或大或小的进攻。

由于朝中两派官僚争斗的激烈和客氏的不断唆弄，熹宗渐渐由任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宦官近侍。魏忠贤这班阉人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乘机从中弄权，勾结外廷官僚，操纵朝中一切大权，于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与东林党作对的各派官员便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形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

阉宦得势，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于天启四年（1624年）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一一遭罢黜。阉党顾秉谦升为首辅，控制整个内阁。魏忠贤又和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勾结，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魏忠贤的党羽在内宫有王体乾、李永贞等30余人为左右拥护；在外廷有崔呈秀等5个出谋划策的文臣，号称“五虎”；田尔耕等5个负责捕杀、镇压异党的武臣，号为“五彪”。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的大小爪牙。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无不遍置魏阉死党。

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而喜欢木工作业。他经常自己动手、劈、锯、刨或者油漆木器，成年累月，不觉厌倦。魏忠贤这班阉党就利用他的这一特性，每逢熹宗正兴致勃勃地做他的木工活计时，就拿出一大堆奏章文件请他审批，或向他请示问题，故意惹得熹宗厌烦。这时，熹宗便随口说：“我都知道了。你们拿下去，自己好好地处理就行了。”就这样，大权便落在魏忠贤手里，使得他能在朝中擅作威福，为所欲为。

魏忠贤经常外出炫耀威风。每次出门，他身坐装饰华丽的车子，驾车的四匹马，飞一般的奔驰，那些身着锦衣玉带，脚踏长筒皮靴、佩着利刃的卫士，夹护左右飞驰，加上随从的优伶、车夫，总共数万人。一些逢迎拍马的官员甚至呼他为“九千岁”。朝中事无巨细，必须派人飞驰至魏忠贤面前请示，经他认可方能办理。熹宗虽然近在咫尺，却无人向他请示，真是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

魏忠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弟侄亲朋，一个个平步青云，官高禄厚。他的侄儿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和少师。而这时的魏良栋、魏鹏翼却都是尚在襁褓

之中的婴孩。面对魏忠贤集团的日益强大，正直派官吏为了解除威胁，很需要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天启四年六月一日，杨涟上了有名的二十四罪疏，对魏忠贤进行愤怒的弹劾。这个奏疏，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无情地揭露了魏忠贤 24 方面的“大罪”。杨涟此疏，可说火力相当猛烈，犹如连珠炮的一阵轰击，顿使魏忠贤被打得晕头转向，他所揭露的事实，句句刺痛其要害。魏阉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他辩解，王体乾等也极力为他辩护。昏愚的熹宗竟偏信不疑，不但没办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但是，朝中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周宗建等 70 多个官员还是冒死上疏，交章弹劾。由于熹宗的昏暗和阉党权势之大，魏忠贤竟逍遥法外，毫毛无损，而为首揭发魏阉的杨涟、左光斗于这年十月被罢官。

杨涟的这次上疏，是正直派官吏对魏忠贤集团的一次决战，杨涟败下阵来之后，双方的斗争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直派官吏开始丧失自己在朝廷上的优势地位，而魏忠贤集团则开始进一步招收朝野的邪恶派人物，逐渐走上垄断朝政的阶段。在这次决战中，明熹宗站在了魏忠贤一边，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说明明熹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也说明了明代历史一再表明的问题：在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明代，在一定的范围内，君主的意旨及其昏庸或开明的品质，对历史的发展面貌，常常是决定的因素。

魏忠贤站稳了脚跟之后，正直派官吏想要动摇其地位，已是不再可能了。以前魏忠贤本来就对正直派官吏不满，一有机会便向之发动进攻；现在站稳了脚跟，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他对东林党人切齿痛恨，决心赶尽杀绝。其党羽也想借机报复，以泄旧恨。阉党崔呈秀等就在魏阉面前煽动说：“东林将害公”，怂恿他镇压异党官员。

权势极大的魏忠贤脾气相当大，不容许有任何异己势力并存于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一时期受魏忠贤及其帮凶迫害最多最重的，是正直的东林派官吏。这时投奔魏忠贤的新、老邪恶派官僚，都把攻击东林当成了讨好魏忠贤的重要手段；此外，新、老邪恶派官僚，特别是其中的老牌邪恶派官僚，与东林角斗几十年，积怨甚深，在东林势衰之时，他们不会放过机会不加报复。于是，新、老邪恶派官僚与魏忠贤结合在一起，展开了对东林党派的大围剿。为了明确打击目标，邪恶派官僚还搞了许多黑名单，献给魏忠贤。如魏广微与顾秉谦编制的《缙绅便览》，将叶向高、韩、越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60 余人为好人”崔呈秀向魏忠贤进《同志录》，所列皆“东林党人”，又进《天鉴录》，罗列反对过魏忠贤的人。王绍微“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零八人为《点将录》，献给魏忠贤。这些黑名单，有的编造和献出可能略早于天启五年，但它们都在天启末年发挥着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由于这场大围剿，魏忠贤虽是总指挥，而出主意、当打手的是邪恶派官僚，这使它在一定意义上讲，实为万历以来正直与邪恶两派官僚相互角斗的续篇，这也使其围剿的题目，往往是万历以来两派聚讼纷纭的老问题。这场围剿，出击频繁，而规模最大的事件有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及《三朝要典》之炮制。

六君子之狱。这是以迫害 6 个正直派官吏（即所谓“六君子”）为主，同时迫害另一批正直派官吏的案件。六君子包括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袁化中于泰昌元年（1620 年）擢御史，杨涟二十四罪疏写出后，他曾继之上疏；这是他遭魏忠贤集团忌恨的一个原因。另外，

高攀龙于天启四年（1624年）揭发崔呈秀贪污罪状时，他参与其事，这也使他不能为魏忠贤集团所容忍。这次六君子之狱将他牵涉进去，乃是对他的进一步迫害。周朝瑞，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由于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广宁巡抚王化贞在对后金的作战中主张不同，造成广宁失守时，邪派官僚徐大化请处死属于正直派官吏的熊廷弼，而当时周朝瑞担任礼科左给事中，他4次上疏为熊廷弼辩护。由上述看来，在这次六君子之狱中，周朝瑞之被牵入其中，也非偶然，是其与邪派官僚多次冲突的结果。顾大章，常熟人，万历35年（1607年）进士，万历46年（1618年）迁刑部主事，天启元年（1612年）进员外郎。他之牵入此狱，也是邪恶派与其冲突的继续。

六君子之狱发生在天启五年（1625年），而其酝酿早在天启四年（1624年）十二月即已开始。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五日这时魏忠贤让许显纯逮捕杨涟等六人。许显纯按魏忠贤的意图办事，进行严刑逼供。许显纯伪造的供状中，坐杨涟、左光斗各受杨镐、熊廷弼贿2万、周朝瑞1万、袁化中6000、魏大中3000、顾大章4万。狱辞上报之后，魏忠贤马上矫旨令将“六君子”扭解来京，究问追赃。另外，狱辞中还罗织赵南星、邓渙、毛士龙、王之寀、钱士晋、熊明遇、黄正宾、卢化鳌等15个正直派人物有“受赃”等罪状。

五月，周朝瑞、袁化中和顾大章先后被逮至北镇抚司。六月，魏大中、杨涟和左光斗先后继至。六月二十八日开始拷讯。

将杨涟等折磨多日之后，七月二十四日夜，狱卒奉令杀害了杨涟、左光斗和魏大中。八月十九日，袁化中被狱卒杀害；同月二十八日，周朝瑞继之。5人既死，顾大章不肯再去那里受苦，饮药自杀，未遂，又找机会上吊自杀了，时在这年九月中旬。

七君子之狱。是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名义上疏的方式，将7个正直派官吏加以迫害的一个事件。这7个正直派官吏有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黄尊素是一位正直的东林党人。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汪文言下狱之案中，曾救助汪文言；同年六月，杨涟弹劾魏忠贤的24罪疏写出后，他又跟着上疏助威。这都使魏忠贤集团对之甚为仇恨。所谓的李实奏疏，上于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它将7个人一齐弹劾，乃是要进一步迫害这七个原已遭到其迫害的政敌。李实奏疏加给“七君子”的罪名是：周宗元做巡抚时，曾贪污公款十余万，而他又是高攀龙的朋友，所以他们都有罪。李实的奏疏递上之后，魏忠贤马上下令逮捕七君子。时为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场大逮捕即杀气腾腾地进行起来。

同年三月十六日，高攀龙在无锡家中得到将被逮捕的消息，很从容地写了两份遗书，一为遗表，一为别友人书，而后赴水自杀。明熹宗是个地地道道的昏君，而高攀龙至死对其忠贞无二，这无疑是一种封建的愚忠表现，反映了高攀龙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阶级局限性；但他宁死不肯受辱的行为，表现了坚决不与腐朽的邪恶势力妥协的鲜明立场和斗争意志。这不是高攀龙一个所独具的特点，而是当时所有的正直派官吏所共有的特征，相互间的差异，只是在具有这些特征的程度有所不同，以及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相互有所区别而已。

“七君子”中除去高攀龙外，其余6人皆遭到逮捕，并死于狱中。

由于正直派官吏是地主阶级中比较进步的势力，因此，在他们与魏忠贤集团作斗争中，常常得到一般群众的支持。在这次魏忠贤集团迫害“七君子”

的过程中，甚至引发了支持被害者的民变。较大的一次发生在苏州。另一次规模较小，发生在常州。苏州民变是由逮捕周顺昌引起的。

1626年，魏忠贤又一次捕东林党，兵士押解了一个东林党官员路过苏州，周顺昌替他摆酒席送行，在宴席上大骂魏忠贤。押送的兵士回去，报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大怒。命令南京巡抚毛一鹭带领东厂兵士，到苏州捉拿周顺昌。

东厂到苏州抓人的消息一传开，轰动了苏州市民。周顺昌为反对阉党遭到迫害，大家也都同情他。东厂兵士到苏州的那天，苏州成千上万市民拥上街头，声援周顺昌。

大家拦住毛一鹭的轿子，几名秀才向毛一鹭请愿，要求取消逮捕周顺昌的命令。毛一鹭见群众声势浩大，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旁边的兵士着急了，厉声吓唬说：“我们是东厂来的，谁敢阻挡！”

市民们被激怒了。群众都高叫起来：“原来是东厂来的奸贼！”大伙一面叫，一面向毛一鹭和兵士冲过去，愤怒的群众赶上去，把他们揪住，劈头盖脑地痛打。几个兵士被打死了。其余的兵士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市民们痛打了兵士，接着要找毛一鹭算帐。毛一鹭早钻出轿子，脱了官服，从一条小巷里溜出去，也顾不得体面，钻到臭气熏天的粪坑角落里。直到市民群众散去，随从们才从粪坑边把他拖了出来。

东厂特务逃回去后，立刻向魏忠贤哭诉。魏忠贤命令毛一鹭派兵到苏州镇压。他们把那天带领市民暴动的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5人抓进监牢，加上一个煽动叛乱的罪名，把他们定了死罪。

当5个人被押到刑场就义的时候，他们神色自若，指着魏忠贤、毛一鹭的名字大骂。他们就义之后，当地人民出了钱，把他们安葬在虎丘东边的山塘上。碑上写着“五人之墓”。

支援周顺昌的民变发生在苏州城里，而同一天苏州城外也发生了民变，这是支援黄尊素的事件。

常州民变是由逮捕李应升引起的。它也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但比苏州民变略晚。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修了《三朝要典》，定所谓三案是非。

《三朝要典》之炮制。这是投靠魏忠贤的邪恶派官僚在取得对正直派官吏的绝对优势后，通过编写史书，就他们与正直派斗争和争论最激烈的三案问题，按照自己的意图，篡改两派斗争史，美化自己，攻击正直派，以便巩固本派的优势地位，并为进一步迫害正直派提供依据的一个活动。

天启初年，正直派官吏在朝迁上占据优势，关于三案的官方结论，是依据正直派官吏的观点作出的。天启五年（1625年）之后，随着邪恶派官僚的东山再起，他们不再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极力进行翻案。天启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邪恶派御史李维垣首先上疏翻挺击一案，此时审理张差的官员王之寀正任刑部侍郎之职，杨疏一上，即被“革职为民当差”。同年四月八日，邪恶派给事中霍维华又上疏全面地翻三案之案，系统评述三案。

在翻三案的同时，邪恶派官僚极力要将按照其观点新作的有关官方结论写进史书中去。这就是魏忠贤新修的《三朝要典》。

推翻了“三案”原来的官方结论之后，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邪党官僚争论是非的官员都惨遭迫害，王之寀被投入监狱，病死狱中，而因“红丸案”被

充军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当上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封为康妃。

为了钳制舆论，魏忠贤又用剿灭东林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用以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魏忠贤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之后，更加专权腐化。其党羽对魏忠贤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尧天帝德，至圣至神”。他们在奏疏中凡提到魏忠贤的地方均称“厂臣”，而不直书其名。内阁在草拟圣旨时，竟然“朕与厂臣”联名并称。天启六年（1626），浙江巡抚潘汝楨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效仿，生祠几遍天下，每建一祠，多者费几十万两银子，少者也要花几万两。这些银子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阉党为了在开封建魏阉生祠，竟拆毁民房 2000 余间，建起九楹的宫殿，状如皇宫。有些官员在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五拜三叩头礼。有个叫陆万龄的监生，甚至无耻地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

天启七年（1627 年）秋八月，熹宗病死，没有儿子，其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即为思宗。熹宗死后，阉党失去依靠，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崇祯帝也明白阉党不得人心，想振兴一下朝政，支撑住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于是，就下令把魏忠贤贬谪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忠贤闻讯，畏罪自杀。忠贤的侄儿、侄孙及客氏的兄弟、儿子都被处死。崇祯二年（1629 年），崇祯皇帝又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分别定罪：崔呈秀等 6 人被定为首逆同谋，即时处决，田尔耕、许显纯等 19 人被定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还有 180 多人被定为交结近侍，分别判处充军、徒刑和革职闲住。同时，还为遭受迫害的东林党官员恢复名誉。

但是，由于当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崇祯皇帝本人生性猜疑，为了控制百官，加强统治，不久，他又重蹈前代皇帝的复辙，信任宦官。在整个崇祯朝，东林党和阉党仍潜伏地对立着，并且时有纷争。崇祯政权复亡后，在南方的几个偏安小朝廷中，这个斗争仍一直继续着，直至朱明残余势力彻底覆亡为止。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过程。

## 利玛窦在中国

在中国文化史上，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中国和西方有过一次影响深远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就是徐光启和利玛窦。

利玛窦，全名玛泰奥·利奇（Matteo Ricci），“利”字，是他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Ri 音译，“玛窦”，这是他的圣名 Matteo 的音节。到中国后，他为自己取的号叫“西泰”，也就是把“泰西”倒过来读（明代称欧洲为“泰西”，“泰”是“极”的意思，由于欧洲在西域之西，故称为“泰西”），因此又称他“利西泰”，或干脆尊称“利子”。他是意大利人，出身贵族家庭，1552年生，16岁时奉父命到罗马神学院学习法律，1571年加入耶稣会。曾跟当时著名的天主教神父、学者克拉维学习数学、地理学和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非常丰富。那么，利玛窦为什么千里迢迢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下当时中国的情况以及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

明朝自英宗（朱祁镇 1436—1449年）以后，开始由盛转衰，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官场贪污成风，吏治更趋腐败。正统以后，宦官开始插手政治，干预司法、军政，甚至发展杀戮朝臣、废立皇帝。到明神宗时，明代宦官专权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宦官专权的结果，使明代的政治更加黑暗，人民的苦难加深，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明中叶以后，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官僚和缙绅、皇族及勋贵通过各种手段大肆地兼并土地，农民则赋税负担日益加重，沉重的赋役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流民几乎遍布全国。

自明中叶以后，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全国各地农民不断地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斗争形式多样，规模越来越大。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地主阶级当权派中已有人意识到再也不能因循苟且下去了。他们呼吁作某些改革，以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样，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发起了社会改革运动。但是，由于张居正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解决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巩固明朝的统治。所以农民的赋役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而且由于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一些眼前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1582年（万历10年）张居正病死后，他们立即群起攻讦，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改革措施逐渐被破坏，明朝的社会危机也随之愈来愈严重了。

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也就是明朝初期与中期时，中西方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一度比较沉寂。可是这段时间双方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化，待到16世纪中期再度恢复接触时，形势就和200年前的元朝大不相同了。就中国而言，蒙古的统治已由汉族的明朝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大的重视与恢复，中国文化界和外人的接触不再存在以前的民族壁障。就意大利与欧洲而言，这两百年正是文艺复兴由萌生而繁荣之时，西方已有较高文化水平，不但在吸收和恢复古典文化方面有了青出于蓝的成就，而且在科学发展方面已开始形成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就比起中国来前进了一大步。这两方面的变化，当然会为新恢复的中意文化交流促成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我国明朝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发展阶段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相仿，正需要

提高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走向近代社会的发展并不顺利，日后终于形成中国落后的局面，然而这些新的发展情况却为明末清初的中意文化交流添了异彩。

15 世纪以前的东西方经济交流多系地方产品的小规模交换，而文化交流往往具有某种贵族的宗教的性质。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归根到底只是与极少数特权阶层有关的事。可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等，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后盾，强制地进入美洲大陆和亚非腹地，剥削和奴役那里的土著居民，强制传播欧洲的宗教，推行欧洲的文化，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16 世纪，西方历史上掀起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为了对抗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发动了一场反改革运动。1534 年成立的耶稣会，就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中坚，后来又是远东传教士的主要派遣者。自从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东来。当时，传教士与商人是相辅而行的。最早派人东来的葡萄牙，在罗马教皇支持下，实行一种派遣传教士随着船队航行的制度。对中国，他们最初也想采用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曾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手拿《圣经》，一手握剑打进中国。

从 16 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1511 年（正德 6 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满刺加（今马六甲）后，随即到中国沿海骚扰，剽劫行旅，抄掠人口，贩运违禁物品。1517 年（正德 12 年）9 月，葡萄牙舰队炮轰广州。对于这种海盗行为，中国军民给予了有力的回击。1521 年（正德 16 年），明军在广州附近的屯门岛驱逐了葡萄牙殖民者。随后，又在广东新会县的西草湾打退了葡萄牙殖民者，并缴获了它的佛郎机大炮。由于中国军民的有力抵抗，葡萄牙殖民者用武力在中国沿海建立侵略据点的企图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葡萄牙海盗商人在广东失败后，窜犯浙江、福建，侵占宁波的双屿、漳州的月港和泉州的浯屿，继续在沿海地方骚扰，先后被中国军民击败。1553 年（嘉靖 32 年），葡萄牙人又贿赂明朝官吏，借口要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物，以每年纳租银 2 万两作为条件，请求上岸居住。得逞以后，他们便在澳门扩大居住地区，建筑城墙、炮台，自设官吏，使澳门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据点。

跟随在葡萄牙后面来到中国的是西班牙人。1571 年（隆庆 5 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吕宋（菲律宾），并盗用吕宋的名义，对中国进行掠夺财货的欺骗贸易，阻碍中国和吕宋的正常经济文化交流。1626 年（天启 6 年），西班牙殖民者又悍然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与西方殖民者侵略我国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陆续来华从事宗教活动。

1511 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满刺加（今马六甲）后就把中国作为下一个战略目标。1514 年，他们曾经一度占领了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1521 年（正德十六年）明朝将领汪鋐率水师大败葡萄牙入侵者，缴获佛郎机铳大小 20 余枝，并把他们从屯门岛驱逐出境。在被击毙的入侵者中，就有一名叫梅尔古劳的传教士。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 16 世纪最早来华的传教士的名字。

16 世纪初，葡萄牙人经新航道至印度，继而至马六甲，1517 年开始有葡人商船至广州，1557 年葡人霸占澳门，西方与中国接触渐趋频繁。与此同时，

在意大利、西班牙与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大力搞“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认为和东方恢复接触是传教扩张的好机会，尤其是当时新建立的耶稣会雄心勃勃，极想使地大物博而又兼古代文明大国的中国“皈依圣教”，因而促成了一批又一批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士来到中国。耶稣会虽然为西班牙人罗耀拉所创，可是其中心仍在罗马，会规且强调绝对忠于罗马教皇，会士多为意大利人，来华者亦以意人贡献为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些意大利传教士客观上仍起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作用。《明史·意大利传》总结这些传教士带来的影响说：“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看来这还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1552年10月，由罗马教皇派遣的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到达广东省南部沿海一个叫上川的小岛，试图偷渡进入中国传教，然而没有成功，不久因病在该岛上去世。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又通过行贿，取得在澳门居留和贸易的合法地位，同时在澳门传教，招收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可是规定中国人入教者，必须取葡萄牙的姓名，学讲葡萄牙的语言，连生活方式也要模仿西方。所以直到16世纪70年代，传教活动毫无进展。耶稣会士范礼安在1578年被派到澳门，主持耶稣会远东传教事务。他提出，既然对中国不可能用武力征服，在传教过程中，也不能采取强迫东方民族改变信仰的办法，主张去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应该首先中国化，学习中国的语言风俗，进入中国后先争取站住脚，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然后再求发展教务。从此，天主教组织开始在中国展开活动。范礼安本人未进入中国内地。

最早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是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年）。他于1579年抵达澳门，先在澳门学习了两年中文，然后于1581年到广州，第二年得到广东政府的许可，在肇庆一带从事传教活动。

紧随罗明坚之后的就是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年），他是意大利马塞拉塔城人，先在印度居留数年，后来决心来华传教。

罗明坚感到一个人势孤力单，要求范礼安派正在印度的利玛窦，来中国协助传教。

利玛窦在26岁时，与罗明坚一起，过去曾到印度传教。当时，亚洲的传教中心在印度的果阿（葡萄牙殖民地）。1582年，31岁的利玛窦应罗明坚的请求，到了澳门。这时的利玛窦，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传教士。他和罗明坚两人，起初学沙勿略当年在日本的作法，剃光头，穿僧服，自称是来自印度之西的僧人，声称一向钦慕中国，申请在中国内地定居。1583年（万历11年），他与罗明坚一起，获得了地方官批准，在肇庆定居。从此，利玛窦和罗明坚一起在这里活动了将近10年时间。

他在这段时间充分掌握了中文、汉语以及有关学识，这一切为他进一步接触中国上层人士打下基础。利玛窦明确认识到，要在中国站住脚必须和明朝中央政府接触，在上层人士中传教。这样，经过多次努力，并通过在韶州、南昌和南京的广泛活动，他最后终于得以获准进入北京，并在北京活动了10年，直到1601年逝世为止。他的墓现犹存于阜成门外二里沟（今北京市委党校内）。

1588年，罗明坚回罗马去了。不久，利玛窦在肇庆的西式住屋被新到任的地方官占居。1590年，利玛窦从肇庆迁居韶州，在城外西市南安桥附近建筑了天主教堂。

到韶州建堂后，利玛窦就开始了传教活动。他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以“西方学者”的姿态，跻身于中国的儒林。与此同时，他也为基督教教义披上了儒家的外衣，写下了著名的《天学实义》。这就使士大夫阶层误以为基督教教义的某些内容，乃至基督教所奉行的神，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早已有记载。因为，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改变了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形象，从此以后，利玛窦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把注意力放在士大夫阶层。利玛窦的成功之处是，能利用西欧地理大发现以来实验科学的一些成就，为传教服务。耶稣会传教士的政治背景和传教目的，从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欧洲最新科学成就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科学，只是传教的敲门砖。然而应该承认，在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方面，利玛窦比起其他传教士来，要热情得多。利玛窦从欧洲带来了大小钟表、天文算术仪器、三棱镜、西洋乐器及欧洲各大城市建筑的图画等，在住处陈列展览。以此引起来访者的好奇心，然后再由这好奇心引发对天主教信仰的兴趣。利玛窦深信，如果求知心切的中国士大夫，接受了西欧近代科学知识，也将比较容易接受西方宗教观。这样，他就把介绍西方科学和中世纪的神学，结合起来了。

1595年4月，利玛窦由韶州北上，去江西南昌，所以，徐光启到韶州时，只见到郭居静而未遇到利玛窦。利玛窦的目标逐步向北发展，以便最后到达北京，然后就等待机会，请求明朝皇帝明令准予居留。当利玛窦第一次到达南京，试图再北上时，当时正值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中国派兵往救，中日之间进行着战争，南京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一个西洋人，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日本奸细”，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他。利玛窦不得不又退回南昌。1597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第一任会长。1599年丰臣秀吉死，明军在朝鲜大破日军，形势趋向缓和，利玛窦的传教活动又活跃起来。从1595年到1600年，利玛窦除二次回南昌，一次赴北京，有过短期外出外，大部分时间住在南京。他利用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广泛结交社会名流，如礼部尚书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以及焦竑、李贽等人。

利玛窦与焦竑、李贽的交往，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南京的领袖人物们交结利玛窦神父》一章中，有所记载：“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贵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誉。后来，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可是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他家里还住着一位有名的和尚，此人放弃官职，削发为僧，由一名儒生变成一名拜偶像的僧侣，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70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利玛窦中国札记》里所说的显贵公民，指的是状元焦竑，和尚，就是李贽。书中还记录了李贽赠给利玛窦折扇和短诗一事。

徐光启从焦竑、李贽处，得悉利玛窦正在南京。他在韶州已知道有利玛窦其人，但印象并不深。他是看到了由赵可怀和吴中明翻刻的世界地图，才知道利玛窦并决心要拜访他的。

徐光启见到的那张世界地图，原来，称为《山海輿地图》，是1584年（万历十二年）利玛窦在肇庆为岭西按察司副使王泮绘制的，后由王泮刊印，馈赠要人。这张地图以后收在明人编的《图书编》一书中，又称《輿地山海全图》，它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引进中国的新型世界地图。大约在1594年至1598年间，驻应天巡抚赵可怀在苏州将利玛窦的地图摹刻于石。1600年，利

玛竇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请，将此图重新修订，并翻刻于南京。这张地图在南京出现后，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自然也使徐光启产生了极大兴趣。

利玛竇绘制的这幅世界地图，是根据意大利米兰安布洛兹图书馆所藏的世界地图为底本译绘的。这幅地图明确标明地球是圆的，图中刻有经纬度、赤道、五带，而且正式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轮廓，地名均汉译，还酌附有关地文、物产等方面的说明。这张图告诉了中国人这样一个全新的观念：地球是球形的，悬在空中，上下各方都有人。欧洲在西域之西，称为“泰西”。从欧洲向西渡过大西洋，是美洲。从美洲渡过太平洋也可到中国。当时，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80年，从欧洲绕地球一周的人，为数已不少。然而，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天圆地方”，中国是“天朝大国”，位于中央，尽管也有过一种传统说法，天体犹如蛋壳，大地如蛋黄，蛋黄当然也是圆的了。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朦胧的猜测，缺乏科学证明。《山海舆地图》用明确无误的事实，改变了人们关于大地是方形的传统观念。利玛竇绘制的这张地图，最初把中国放在地图的极东一角。王泮看了大怒。后来利玛竇把福岛零度经纬线移位，放在图中央，中国也移居图之中央。利玛竇改绘的这幅图特地把中国放在中央位置，这样就很能符合中国人的“老大”心理。同时，他还能用各种仪器，把这些观念解释得头头是道。在当时，拒不承认地球是圆的的顽固派还有不少，但许多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都比较容易接受。看了这张图，徐光启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对五大洲的分布有了清楚了解，从而激发了他放眼世界、了解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愿望。

徐光启特地去利玛竇处拜访。利玛竇当时已49岁，比徐光启大10岁，两人却一见如故。

一般说来，到利玛竇处去的人，也是首先被他那五花八门的科学仪器所吸引的。他们两人从天文到地理，从日、月蚀到经纬度，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到绘制地图和测绘学，谈得十分投机。可是利玛竇则三句不离本行，在不知不觉中又把话题转入传教的正题。利玛竇到中国来，目的是宣传天主教教义，科学只是他的进身之阶。第一次谈话，并未使徐光启立即下入教的决心。然而，天主教的教义，几年前已在韶州听郭居静说过，因而这次留给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3年后，徐光启又一次到南京去拜访利玛竇，但此时利玛竇已上北京，接待他的是罗如望。从罗如望处，他得到了利玛竇写的两本书：《天学实义》和《天学十诫》。《天学实义》是利玛竇平日讲道及与中国士大夫争论探讨的记录，用汉文写成。利玛竇从中国的《诗》、《书》、《礼》、《易》和《中庸》等典籍中，找到了一些关于“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中庸》）之类记载，用来证明中国古代早已有“上帝”的观念，“上帝”与“天主”是同义语。

利玛竇于1601年1月24日（万历28年12月21日）进京，向万历皇帝贡献了礼物。贡品中有绘制精美的耶稣像、圣母玛利亚像、《圣经》，还有珍珠镶嵌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一座，《万国图志》一册。

万历皇帝见了很高兴，把那座十字架放在案前；那架自鸣钟尤其受到皇帝的喜爱，看到钟的时分针能随着滴答的声音移动，准时叮当报鸣，视为天下奇物，就下令安置在殿内，还派了两名太监看管。刚开始，太监不懂定时要上发条，走了一段时间后，时钟停摆，以为是被弄坏了，引起了一场虚惊。

太监们怕自鸣钟坏了不会修，万一皇帝发怒，将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千方百计地要留住利玛窦。然而，礼部官员因利玛窦自称“大西洋国人”，而查《会典》中没有大西洋国名，怀疑利玛窦的来历，而且又因他是通过走太监的内线送礼物给皇帝的，自然对利玛窦有反感，几次想把他打发回澳门，可是，没有成功。毕竟太监们神通广大，最后万历皇帝下令，每月给利玛窦一定数量俸钱，并可在京城居住。最初，利玛窦住在四夷馆，皇帝赐宅后，住在京城西南方向的宣武门内东边，不久以后在住宅旁又修筑了教堂。

利玛窦在罗马神学院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曾将拉丁文本加以注释说明，题为《欧几里得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时所用的本子，就是克拉维上课时所用的讲义。

利玛窦踏上中国国土后，不久就发现中国人对数学，特别是对几何学，有兴趣者很多。假如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同介绍西方的各种科学仪器一样，容易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有利于传教。然而当时还没有汉文版，所以，在讲授时碰到了许多困难，影响有志学习者的深造。十几年前，还在广东韶州传教时，利玛窦就有过翻译此书的念头。一个名叫翟太素的文人，曾决心翻译此书，然而失败了。为翻译这部书，利玛窦曾三进三止，深知其中的甘苦。

当徐光启提出要翻译此书时，利玛窦详细陈述了翻译的困难和几次失败经过。他告诉徐光启：中国和西方语法不同，词汇不同，第一次翻译拉丁文的数学书，许多专用名词，汉语中都没有现成的，无成规可循。利玛窦的汉文底子虽不错，照本宣讲，了然于口，还可以做到，但是要逐字句地翻译，就非常艰涩，他人也不易理解，因此认为恐难胜任。利玛窦对翻译此书的兴趣，不象过去那样浓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北京已站住了脚，因为，博得了万历皇帝的欢心，而名闻京师。士大夫们以与利玛窦交往为荣，利玛窦也热衷于与政界和学术界的社會名流进行广泛接触，忙得不亦乐乎。本来，利玛窦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传教，科学只是他用来打进士大夫圈子的一块敲门砖，现在门已敲开，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情便自然减退了。徐光启在中进士那一年写的《跋二十五言》中，称利玛窦“自来京师，论著复少。”徐光启劝他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书，做一件千古大快人心的好事。当问他是否愿意时，利玛窦既不拒绝，也未爽快答应，只是推托说：“现在忙得很，没有空闲，还是等一等吧！”

经过几次商讨、辩论，利玛窦最后同意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翻译西方科技书籍。

1606年（万历34年）秋，他们正式合作译书，冬去春来，时光荏苒。第二年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完了前6卷。后来由于利玛窦忙于传教，而使余下部分未能译出。1608年（万历36年）春，利玛窦将已刻成的《几何原本》作一次校正后寄给徐光启，并建议若南方有人有兴趣，可再版重刻。

1610年5月11日（万历38年）这一天，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教徒们请了一位画家，替去世的利玛窦画了一幅像。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上疏，奏请万历皇帝赐茔地，让利玛窦在北京安葬。这时，几年前在南京与利玛窦有过交往的叶向高，已任东阁大学士，也从旁协助，最终促成万历皇帝批准了这个请求。徐光启返京后，正赶上参加利玛窦的安葬仪式。对于利玛窦的逝世，徐光启十分悲痛。

利玛窦以掌握中文汉学，传播西方学识为手段，从而达到其传教的目的，

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他在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受限制，这是因为传教活动和天主教世界观是与他带来的文艺复兴的科学文化背道而驰的。所以近人曾经假设，假设传入这些科学文化的，不是狂热的耶稣会士，而是“另一批具有近代头脑的人”，使中国文化界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近代科学体系直接接触，其后果当会积极得多。然而就事论事，我们仍应肯定他作为介绍西方文化于中国、又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于西方的第一位近代人的功绩。他在晚年曾写下札记，准备向会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传教事迹，死后由另一来华教士金尼阁编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一书，在17世纪初即风靡欧洲，不胫而走，先后有法、德、西、意、英文译本（利氏札记原用意大利文，金尼阁编译为拉丁文）。后来利玛窦的原稿也存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1910年以《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之名刊布，近年来我国已将其中札记部分译出。利氏总结他在中国活动和了解情况优于前人之处说：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30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有了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

所以，他对中国情况的介绍，比起马可波罗等人，就更为真实、具体，也更为全面。除了中国地大物博，繁荣昌盛，无与伦比这个总情况，他还较多地谈及工艺技术、汉字结构、人文科学等，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把孔子和儒家学说介绍于西方的人。因为他在罗马已受过较高深的教育，在数理之学方面掌握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基本学识，随身又带有天文仪器、自鸣钟表、地图眼镜以及洋书洋画之类，所以，他也确实以这些西学法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重视，尽管他以用基督教远征中国自命，然而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感谢他的，却不是他的传教活动，而是他介绍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万国舆图》等书。据说他逝世后，对他是否应得到官赐墓地一事，朝廷曾经有过争论，而肯定他的功绩的一位中国官员说：“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这句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利玛窦不仅博学多才，善于辞令，娴于交际，而且又对儒学孔教等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等表示尊重，所以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很受欢迎。这固然为他的传教事业开辟了新局面，可是，也为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尽管是不甚理想的窗口，通过和利玛窦的接触，中国知识界有不少先进人士“领洗入教”，同时也得以吸取西学中有用的部份，为我国学术的发展带来新鲜空气。这些人中知名之士有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冯应京、张焘等，尤以徐光启贡献显著。

## “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明朝宣德十年（1435年），38岁的宣宗朱瞻基病死。他9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正统。他就是英宗皇帝。他在位的时期，是明朝几个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

英宗当太子时，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伴他读书，即位后，他便把王振提为司礼监太监。

当初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曾禁止宦官干预朝政；后来明成祖违犯了这一规定，开设内廷二十四衙门，都由宦官把持。司礼监是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掌管皇城里的礼仪、刑事等杂役，更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复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根据皇帝的旨意交内阁撰写诏书，然后颁布下去。司礼监的宦官成天在皇帝周围，往往善于迎合皇帝的旨意，取得皇帝的宠任，利用皇帝和外廷官员接触少的弱点，蒙蔽和架空一些昏庸的皇帝。他们在代皇帝批复奏章和传达皇帝的命令时，常常是私下加以歪曲篡改，以此来控制、威慑百官，造成皇权旁落，宦官专权。王振掌握了这样重要的机构，他便利用来为自己夺权争利，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自从明代建国以后，直到宣宗时期，宦官都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作用。王振是明代第一个专权的大宦官。他是山西蔚州（今山西省蔚县）人，早年是个流氓，后来自己净身之后就进宫当宦官，认识不少字，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所以得到了明宣宗的赏识。明宣宗的儿子朱祁镇被立为太子后，王振被派去侍奉，并教太子读书认字。王振平常十分严肃，朱祁镇有点怕他。王振又很会逗朱祁镇玩，所以朱祁镇又有点离不开他。

明英家当皇帝的时候，才9岁。皇帝年幼无知，贴身宦官王振因为教他识字，身份突然显赫起来，权势也就不断地膨胀，小皇帝称他为先生，对他非常尊重。

王振虽受宠任，权势很大，但在开始的几年还不敢过于放肆，因为这时的太皇太后张氏还掌管着朝政，她把政事委托于“三杨”等元老重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有些大事还亲自过问。她见王振为人奸诈险僻，就派人把王振召来，令他跪在地上，严厉地训斥他：“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应当赐死。”王振吓得直打哆嗦。这时，英宗和诸大臣都跪下为他求情。张太后才改变颜色说：“皇帝年少，不懂得宦官掌权后造成的危害。我看在你们的面上，饶了王振。但是，此后不许他干预国事。”每隔几天，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办了些什么事情，如果发现有不通过内阁而由王振自己决定办的事情，她就把王振叫来，痛责一番。王振虽然受到这样的制约，但由于他的地位重要，大权在握，一些阿谀谄媚、趋炎附势的官员争着投靠到他门下，因而，权势日重。渐渐地，连张太后也约束不了他了。

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病故。“三杨”中，杨士奇、杨荣先后病故，仅杨溥在朝，但年老多病，其他阁臣恰又是一些资历较浅的官员。于是，王振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朝中的大臣们谁要不买他的帐，王振就千方百计地整他。侍讲刘球在奏章中得罪了他，王振怂恿明英宗把刘球关进监狱，派心腹把他杀了；御史李铎遇见王振不下跪，便被降职并调到铁岭卫（今辽宁省铁岭县）；驸马都尉石璟骂了王振家的阉宦，王振认为这样辱骂宦官就是轻视他，被王振逮捕下狱，几乎送掉性命。凡是对王振不礼貌的大臣，都

遭到了他的陷害和打击。而那些对王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官员，却步步高升。例如工部侍郎王佑，不长胡须，王振问他：“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佑讨好地说：“爷不长胡须，儿怎么敢长呢！”王佑因此得到了王振的欢心，从此官运亨通。像王佑这样堂堂的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竟然这样不知羞耻地讨好王振，可见王振的权势有多么大！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昏庸的英宗却反以为忠诚，即使是后来长大成人了，也仍然执迷不悟。正统十一年（1446年），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等物，并特赐敕一道，内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由此可见英宗是昏庸透顶的，像他这样的昏君不出大乱子就怪了。

果然，在王振这帮奸党的扰乱下，大明帝国北面的边防受到严重削弱。首先是军屯制度开始破坏。当时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和将官，往往侵占军士的屯田为私家庄田，并役使士兵替他们耕种。军士失去屯田后，官吏照样逼取额粮和税收，军士受不了这样的剥削和虐待，只好逃亡。王振为了满足其贪婪的欲望，还不惜勾结蒙古贵族，进行大量走私。王振叫他的私党、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私造箭镞数十瓮送给蒙古族的瓦刺部落，瓦刺就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边防力量日益衰弱，而瓦刺又对明朝虎视眈眈。鉴于这种形势，有的官员建议在要害处增筑城堡，整饬边防，防御瓦刺入侵。但是宦官专权，朝廷黑暗，没有人敢积极主张，这个正确的建议也就被束之高阁，从此边防力量更加薄弱。

与腐败透顶的明朝正相反，当时蒙古族的瓦刺部落十分强盛，它的首领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继了王位，总想和内地多做一些买卖，以满足本族人的需要，但常常遭到守边将领的限制。也先对此十分不满。正统14年的春天，也先派两千多人向朝廷贡马（实际是交易的一种形式），为了多得赏赐，谎报是3000人。王振因此恼怒，说是欺骗朝廷，仅给马价的五分之二，并叫礼部不要给多余的人饭吃，这一来就伤了和气。也先还想与明朝通婚，也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也先策划率兵内侵。

紧急的边报接二连三地飞向北京，王振想乘机挟持英宗亲征，自己趁机立一大功，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发出英宗亲征的命令，限令两天后出发。举朝上下听说皇帝要亲征，而且又如此仓猝，都非常震惊，纷纷谏止。但英宗听信王振的话，一定要亲征，命自己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他于7月16日和王振率50万军队匆匆从北京出发。

当时，也先的兵马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是早就有所准备。王振却轻视敌人，他以为大兵一出，即可马到成功，待到凯旋的时候，邀皇帝路过他的家乡，自己也可炫耀权势，光宗耀祖，这番如意算盘竟害得全国上下不得安宁。

由于是临时决定出发，军队上下都来不及做更多的准备。许多士兵连武器和军装都未带齐。王振不管这些，只顾命令士兵们日夜兼程。这样仓促的出发，接着又遇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刺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冻饿而死的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王振派出的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刺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王振感到情况危急，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根本不懂军事常识，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

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故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英宗迂回周折，13日才逃到土木堡。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正确的指挥应当是进城驻守。但王振因为自己装载财物的车辆千余部未到，不愿进城，就留英宗驻扎在土木堡。兵部尚书邝埜见形势十分危急，力请英宗迅速入关，留重兵殿后。王振拒不采纳，而且斥骂说：“腐儒哪里懂得军事，再胡说就砍你的脑袋！”喝令士兵把邝埜拉出去。14日，敌军追至土木堡被重重包围。土木堡地势高，挖井二丈多深还取不到水，而南面的河流又被瓦刺军占领，人马已经两天没喝到水，饥渴难耐。士兵们更加惊慌，士气非常低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刺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本来不想讲和，准备硬攻进明军阵营里去。可派兵事先一打听，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也先看得清楚，单等明军阵营一拉长，便两面夹攻，瓦刺士兵手执长刀，奋力砍杀，士气非常旺盛，大喊“解甲投戈者不杀！”呼声震天动地，一下子就把饥饿、干渴、疲惫不堪的数十万明军打垮了。随军的大小官员数百人也死于乱军之中。

明英宗也真侥幸，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士兵们死伤惨重，他却安然无恙，一点都没伤着。他见败局已定，实在无法脱逃，便绝望地下马，盘腿坐在草丛之中，瓦刺军队打扫战场时，发现了。明英宗被带到一个叫雷家站（即当时的保安州，今河北省怀来县西北）的地方。也先叫了两个曾经见过明英宗的瓦刺人去辨认，证明确实是明朝当今皇帝。也先高兴极了，没想到这一仗战果这么辉煌，竟然俘虏了大明帝国的皇帝！

英宗被俘后，护卫将军樊忠把怒火都集中在王振身上，冲上去一铁锤把他捶死，痛骂说：“我为天下诛此贼。”

土木堡一战，明英宗被俘，数十万军队被歼，数百名官员丧命。历史上把这次战役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明王朝元气大伤。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刺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土木堡大败的第二天，即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8月16日深夜，前方将士便派快马把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告诉了皇太后和郕王。刹那间宫廷里一片慌乱，恐惧万分。满京城里的大小官员都惊呆了。天不亮，他们便不约而同地会聚到午门之外，面面相觑，谁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一位官员急得大哭起来，接着所有的官员都放声痛哭。皇太后急得哭哭啼啼，从宫里内库捞出大量金银珍宝、绫罗绸缎，偷偷派太监带着财宝去寻找瓦刺军，想把英宗赎回来。结果，当然是毫无希望。

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的职权），并且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瓦刺。大臣们议论纷纷，不知怎么办才好。大臣徐有贞说：“瓦刺兵强，怎么也抵挡不住。我考察天象，京城将遭到大难，不如逃到南方去，暂时避一下，再作打算。”

兵部侍郎于谦神情严肃地向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的，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

于谦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太后决定叫于谦负责守城任务，他可以指挥京城内所有军民。

于谦，字廷益，是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宣德朝任御史，巡按江西，为许多人平了反，申了冤。后由杨士奇举荐，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他每到一地都大力兴利除害。正统六年（1441年），他向朝廷提出一个建议：“以河南、山西各积存的数百万谷子，在每年的3月借给缺粮的贫苦下户，待秋收后收还；那些老病和贫穷无力偿还者，官府就免收他们的借粮。”英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谦巡抚河南之时，黄河不时决堤，带来许多破坏。他组织民众筑堤治水，并命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在山西，他剥夺边镇军官私占的土地为官府屯田，充作边防费用。“三杨”掌权的时候，对他非常器重。他所提的建议，总是很及时地被采纳。王振专权时，一些无耻的官僚争相以搜刮来的民脂贿赂王振，以取得他的欢心，而于谦生性刚直，每次进京，都是两袖清风。因此，王振忌恨他，把他关了三个月的牢房，释放后又降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官民纷纷上书朝廷，请求留他在原任。朝廷批准了官民的要求，仍以于谦为山西、河南二省巡抚。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入京任兵部左侍郎。英宗亲征前，他极力谏止，没被采纳。现在，他的反对南迁、力主坚守的意见得到郕王的赞许。郕王下定决心坚守北京。当时，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了，剩下的10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京城内人心惶惶。于谦经郕王批准，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他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守，人心才稍为安定。为便于指挥所有的军队，郕王把他提为兵部尚书。

于谦在国家危难之中接受任命，他一面命令各边关的镇守将领加强防备，一面奏请郕王批准，敕令工部从速修缮器甲、战具。同时派兵严守京城九门，把靠城的居民全部迁进城内；还选拔几名能干的文臣做巡抚，提升能战的石亨、杨洪做将帅。而他自己也以军国大事为己任，身先士卒，勇于负责，立下军令状：“不见成效，甘受处罚。”

为了进一步安定民心，于谦和其他几位大臣上疏要求清算王振罪状。朱祁钰不敢作主。有个宦官马顺，是王振的同党，一个大臣冲上去揪住马顺，大伙赶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就把马顺揍死了。

朱祁钰见到朝堂大乱，想躲进内宫，于谦拦住他说：“王振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陛下只要宣布王振罪状，大臣们就心安了。”

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便下令抄了王振的家，惩办了一些王振的同党，人心才渐渐安定下来。

接着，大臣们议论立皇帝的事。大家认为国家正处于危难之秋，人心惶惶，国不可一日无君，必须另立一个皇帝以安定人心。于是，群起上书，劝郕王早登大位。九月初六，郕王正式登上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史上的景帝。景帝的登基，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自己抓到了一个活宝贝，想利用来要挟明朝赔款割地，没料到明朝又立了一个皇帝，他手中的这张牌就失去了作用。只能

利用英宗到边镇去要挟一些粮草财物。

景泰皇帝给了于谦最大的信任，明令各营将士一律听从于谦的指挥，如果不服调用或失职犯禁，可以先斩后奏。当时，虽说各地入卫京师的军队已陆续到达，备战工作也基本就绪，但将领们都有些畏怯。在于谦召集各将领研究战守方案的时候，身为总帅京营兵马的石亨就竭力主张把军队全部撤进城内，以土壅闭城门，坚壁清野。他认为敌人无法破城，自己便会退却。不少将领同意他的说法。于谦指出这将使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只有打败他们，才能得到和平。石亨最后同意了于谦的正确建议。于是重新调配7兵力，除守城兵以外，用二十多万人马，列阵在北京九门之外。他自己亲率石亨等人扎营在德胜门外，面对着敌来的方向。为了激励将士，于谦还下了一道严令：凡临阵打仗时，将官不顾士兵先退缩的，斩将官；士兵不顾将官先退的，后队斩前队。同时，下令封闭了北京的所有城门，堵塞了退路，使将士增加了死战的决心。

10月13日，瓦剌军攻北京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空屋里，然后派数骑诱敌。瓦剌一万多名骑兵追击进入埋伏圈后，一声炮响，伏兵四出，将士们奋勇向前拚杀，直杀得瓦剌军人仰马翻，大败而逃。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受到明军的坚决抗击。在德胜门北面土城的战斗中，明朝军民配合作战，土城老百姓纷纷爬上屋顶，以砖石为武器，铺天盖地般地投击敌人，喊杀声震天动地。两军相持了五天，瓦剌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也先本想挟持着明英宗，逼明朝城下议和，捞取金银财物，没想到一个子儿也没捞到，反倒损失了许多人马。这时候明朝的各路援兵快要到了，也先恐怕归路被切断，于是，又拥着明英宗匆匆撤围西去。于谦指挥军队乘胜追击，夺回了瓦剌沿途掳获的许多百姓和财物。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北京军民的爱戴。明景帝十分敬重他。于谦家的房屋简陋，只能遮蔽风雨，准备给他造一座府第，于谦推辞了。他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怎么能贪图享受呢？”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京师的守护，于谦除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北边防务之外，还在西面和南面的涿鹿（今河北省涿县）、真定、保定、易州等处设镇屯兵。他还改革军制，设立团营，从各营中挑选了马步骁勇者15万人，分为十营，每营委派一名都督；每五千人为一小营，委任一名指挥管带；以石亨、杨洪等人为总兵，自己兼任总督。将士们每天都得在营操练战阵。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也先退出后，心生一计，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朝的主和派因此又吵嚷着要与瓦剌议和，甚至许多主战派官员也认为必须迎回英宗，倾向于妥协。

于谦识破也先的阴谋，他力排众议，指出这是敌人企图借此向我索取财物，并说：“国家的利益最重要，不能因为一个皇帝牺牲全国的利益。”他派人提醒各边镇将帅，不要中敌人的奸计，要做好防御工作，并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他号令严肃，赏罚分明。在于谦的整顿和指挥下，边防力量大大增强，各边镇的将帅也都主张抗战，也先在景泰元年（1450年）的几次侵扰都受到严厉打击，阴谋未能得逞。

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使也先更无隙可乘，而明朝又识破瓦剌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拒绝与他议和言好，逼使也先无计可施。明朝不再与他贸易，也先得不到必须的物品，也非常着急，为了恢复与明朝的边境贸易，也先在景泰元年8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后，当个名

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

于谦临危不惧，运筹策划，指挥若定，挽救了明王朝的一次危难，在惊涛狂澜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此后也先虽曾入寇大同，包围代州（今山西省代县），但都一再受挫，始终没能长驱深入。明王朝和它的首都北京，在七八十年内再也没有受到敌骑的蹂躏，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于谦的努力分不开。

明英宗在瓦剌部落过了整整一年的游牧生活，送回北京进住南宫之后，过着清闲的生活。但他并不死心，时刻想着复辟的事。

景帝自己虽已从亲王的地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其接班人仍然是英宗朱祁镇的儿子。为了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景帝在景泰三年（1452年）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一年多后，朱见济夭折。景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再也没人可以继立为太子了。

这样一来，朝中就出现了争论。本来，在废朱见深时，有些官员出于维护封建礼法的目的，对这件事就不予赞成。现在朱见济一死，他们又纷纷请求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但是，景帝无意传位给朱见深，对那些官员的请求不予理睬，他一直不露声色。他认为自己才20几岁，年纪尚轻，等又有了儿子后再立太子也不晚。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正值新春佳节，宫廷里却阴云笼罩，年纪轻轻的景泰皇帝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已经20多天没有接见朝臣了。这引起了大臣们的忧虑和慌乱：要是景泰皇帝真的病逝了，谁来继承皇位呢？

当时，朝中各派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不停地活动。朝中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一些不得志的人，还有王振的余党宦官曹吉祥等，企图利用景帝和英宗兄弟间的矛盾，发动宫廷政变。他们一起密谋策划，要趁景帝正在病中，迎英宗朱祁镇复辟，事成之后，论起迎复之功，肯定都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赐，并可以加官晋爵。阴谋制订之后，这帮野心家便单等着景泰皇帝一命呜呼了。正月12日，景泰皇帝躺在病榻上召见了石亨，叫他主持一下祭祀的事情。石亨从宫里出来告诉曹吉祥等人说：“皇帝有气无力，看样子是不行了，咱们应该马上行动，再晚就来不及了！”

正月十六日半夜之后，石亨等人以边官报警，应加强警备，以防万一为名，带兵千人进入皇宫，直奔软禁英宗的南宫，撞门毁墙，接出英宗，把他抬到奉天殿升座。当时文武百官正在朝堂等候景帝视朝，徐有贞对众人大呼：“上皇复辟了”，胁迫众官员进殿贺喜。事出仓猝，众官员一时摸不着头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又见大殿上坐的果真是太上皇，只得列班朝贺。这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成功了。历史上称它为“南宫复辟”，因为是撞破宫门之后才把英宗抬出来复辟的，所以这次事变又叫“夺门之变”。

明英宗复辟成功之后，徐有贞、石亨等人，个个弹冠相庆。英宗重新当了皇帝，当然得好好奖赏有功人员。于是，徐有贞封了武功伯，升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管内阁大事；石亨被封为忠国公；张軏被封为太平侯；曹吉祥升任宫中司礼监太监，并封他的侄儿曹钦为昭武伯。一时间经他们请功赐赏的不下四千余人，封官之滥达到了顶点。

他们爬上高官显位之后，首先就是排除异己，最先打击的就是于谦和王文。这两个人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秉公执正，不徇私情。徐有贞在北京保卫战的时候叫徐瑄，他倡议南逃，遭到于谦的训斥。后来怕人笑话他，改名为徐有贞。石亨是在保卫北京时立了战功的将领，但贪得无厌，屡次遭

于谦的抑制，心怀不满。王文是内阁大学士，是于谦得力的支持者。由于这两个人威望很高，因此遭到了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忌恨。他们在拥立明英宗复辟之后，无中生有地说于谦、王文勾结太监张永等人“逢迎景泰篡位”，“紊乱朝政，擅夺兵权”，把军国大事都弄坏了，还说于谦等人见景泰皇帝有病，阴谋派人迎立襄王，“入继大统”。而不准备立英宗的儿子为皇帝。他们这样攻击于谦和王文，是为了让英宗恨于谦和王文，然后除掉。

英宗复辟后，废景帝仍为郕王，并把这一年改为天顺元年。病中的景帝被迁到西宫，没过几天就死了。有说是被害死的。景帝究竟是怎样死的，成了明史上的一个无法澄清的疑案。景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英宗重新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徐有贞一伙对于谦的诬陷根本就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这种事情本来是容易弄清的，但是明英宗却深信不疑，下令对于谦、王文拷打审问。石亨的党羽肖维祯以都御史的身份主持会审。

肖维祯动用各种刑具折磨于谦和王文，但总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就以想要迎立外藩的罪名，判决凌迟处死于谦、王文。奏折到了皇帝跟前，明英宗犹豫说：“于谦保卫北京确实有功。”徐有贞说：“如果不杀于谦，陛下复位可就没理由了。”一句话使明英宗批发了杀死于谦、王文的旨令。后来由于大臣们奋力为于谦二人说情，才将凌迟处死改为斩首处死。

于谦本人被害，家属发配边地充军。抄家时，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在那多事的岁月，他常常是睡在朝房里没有回家。真是个铮铮汉子，耿耿忠臣，就像他生前写下的一首《咏石灰》诗所表白的那样：“千锤万斧出深山，烈火烧身只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老百姓都为他难过，无不认为是天下的一大冤案。

在杀害于谦的同时，徐、石等官僚又把于谦平时举荐、重用的一些官员、将领加以杀害、谪戍、罢官。一些希图取宠上爬的卑鄙小人无不以攻击于谦为进身之阶。这样还不够，他们又大改于谦创立的一些制度，连团营也被罢废，恢复原来的三大营。这样一来，明朝的边防力量又削弱了许多。

他们还搞了一个“奸党录”，捏造了很多罪状，在全国范围内公布。朝廷中正直的官员差不多都被他们陷害光了。从此，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都以大功臣自居，公开纳贿，无所顾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小人希图升官发财，钻营奔走，拍马溜须，无所不至。明代政治秩序与社会风气，经过这场变乱，更加败坏了。

##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世界上有两部非常杰出的、以战争为题材的古典文学作品。一部是俄国的《战争与和平》，一部是我国的《三国演义》。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以宏伟的1812年俄法战争为描写中心，通过4个豪族的生活和斗争，展示了19世纪初俄国社会历史生活的画卷。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是描写东汉末年，大小军阀在镇压黄巾起义之后，乘机发展势力，扩充地盘，为争夺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作者艺术地再现了三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客观历史，并且对我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了初步的感性描述。作者对封建统治者贪婪、残忍、阴险狡猾的狰狞面目也进行了有力的暴露。作者还用浓墨重彩把历史上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描绘得有声有色，并塑造了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部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作为我国古典小说名著，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及其籍贯与生活年代，历来有不同意见。有的说罗贯中，贯中是字，名卿是别号；有的说名字或称罗本，或称罗道本，通常则称之为罗贯中；有的说，他号湖海散人；又有的说叫他叫罗贯，字本中。作者哪里人呢？有的说是太原人，有的说是东原人（有的说他是中原人，而“中原”可能是“东原”之误），有的说他是钱塘人。

作者生活在什么时候呢？有说宋，有说元，有说元末明初，又有说明代。他做过些什么？有人说他是位戏曲作家，写过《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f i 非）虎子》和《忠正孝子连环谏》等杂剧；有的说他是小说家，除写了《三国》、《水浒》而外，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平妖传》；又有的没有提到他写戏曲或小说，只说他好做谜语；有的怀疑他只是个书林主人，即是一个小说的出版家。还有的说他是“有志图王者”，即要谋反起义的人。

这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一般认为，作者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生活在元末明初之际。

作者生活过的元末社会，是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实现了一个少数民族对于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经历了一百零几年，最终为明朝朱元璋所取代，这样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劳动人民遭受严重的剥削、掠夺和压迫，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

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代的反动统治，最高的政治权力为朱元璋所掌握。这个由贫苦农民出身的起义军领袖，做了明代的开国皇帝，建立了又一个封建王朝。尽管他汲取了以往一些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但是，从政治到经济所实行的那一套措施，还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曾经用过的。广大人民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的桎梏之下。

《三国演义》的作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既动荡又可悲的历史时代。是什么原因激发了他去写这部长篇小说？我们虽然所知甚少，然而，时代召唤文学的原理是毋庸置疑的。

动乱的时代，才会产生反映时代动乱的伟大作家。空前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可能是导致作家对纷纭复杂的三国历史产生特殊兴趣的诱因之一。

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东奔西走，南北漂泊的生活，又使作家耳濡目染了

异族统治的专横暴虐，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或许就是他从事“稗史”（指间巷风俗、轶闻旧事的记录，也可泛指“野史”和小说。）编写工作的重要触媒。

《三国演义》中对社会动荡分裂状况的描写，对军阀董卓等杀人不眨眼的魔君的批判和揭露，对无辜百姓一次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景的摹画，自有其现实生活的影子。同时，从各种传说材料来看，作者罗贯中又不是一般封建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从事过反元活动的“有图王者”。他在《三国演义》中，不但肯定蜀汉的正统地位，而且更把刘备写成一个平生不做利己妨人之事的仁君，把诸葛亮美化成为一个对封建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贤相，而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这些蜀汉的精英，不仅一个个武艺超群，万夫莫敌，而且他们与封建君主之间又能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形成兄弟手足的君臣关系，这与生灵涂炭、贤能埋没、忠良枉死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十分鲜明强烈的对比，这里有浓重的理想主义成分。毋庸讳言，这种理想还是封建知识分子向往清明政治的社会理想，但它既然植根于“一团混乱”的社会现实土壤之中，就有与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有某些相通之处。

《三国演义》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它写作于元末明初，开始是抄写本。最早刊行而与广大读者见面，是在嘉靖年间了，离开作者写书，已历100多年了。自明代中叶以至明末崇祯年间，书坊的刻版印刷大盛，《三国演义》的刻本很多，现在能见到的也有10来种。他们基本上都保持了嘉靖本的面貌，文字的改动很少。

解放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就是以毛宗岗评点过的《三国演义》为根据，删去了一些“后人诗赞曰”之类的诗，和毛评本的序言、凡例、读法、点评、回评、夹评。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了《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实即嘉靖本），使我们有可能把两种本子加以比较。为广大读者研究欣赏这部伟大作品提供了方便。

那么，这部不朽的历史巨作，到底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仔细考察这部历史小说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有三个流传系统。

首先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为中心的历史系统。

三国故事在历史系统的流传过程较长，是以褒贬人物纪鉴史实为主要目的的。

隋唐以后，三国故事进入文学的范围广泛流传，出现了在话本系统和杂剧系统并行发展的局面，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却与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较大。唐宋之际是中国的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的商品生产，造成了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一批新兴的商业都市出现了。北宋的都城汴京，集四方商旅，聚富贵荣华，无比繁荣。当时的北方重镇边城北京，南北店铺林立，行货钱财丰盛。南宋的首都杭州，万物所聚，客贩往来。在繁华的商业都市里，市民的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为了适应城市市民们文化娱乐活动的需要，在勾栏瓦市里说话人讲说三国故事和艺人们搬演三国故事的杂剧，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这就是三国故事得以在话本系统和杂剧系统广泛流传、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三国”故事，从三国混一于西晋到隋统一以前的300多年之间、是在

历史系统流传的。

在陈寿的《三国志》未问世以前，魏国和吴国两个国家已经分别有史。王沈的《魏书》和韦昭的《吴书》都还是官修史书，私撰的史书有鱼豢的《魏略》和陈寿所撰的《益部耆旧传》10篇，后者后来成为《三国志》中蜀史的部分内容。

陈寿的《三国志》，把他所能够见到的、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三国历史记载收集起来加以选择，经过取精去芜，去伪存真，写成《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三书合称《三国志》一共有65卷。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曾被合称为“四史”。南朝宋裴松之称赞陈寿之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是陈寿终因囿于自己的见闻，许多历史记述他都不曾见到，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失之于简略和脱漏。为了补正《三国志》的这些缺陷和不足，习凿齿曾经写有《汉晋春秋》，他补充了一些《三国志》中所没有的历史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晋春秋》明确地尊蜀汉为封建正统，自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后，大都是习而非陈，端倪即由此而开。

到了东晋以后，发现的历史资料逐渐增加。

南朝宋的中书侍郎裴松之起而为《三国志》作注解。他广泛地搜辑史册多达210多种，以用来补充陈寿的《三国志》。这可以说是一位集流传的“三国”故事之大成者。

裴松之所采辑的三国史料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121种，其中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形成影响较大的有22种，它们分别是孙盛所著的《异同杂语》和《异同评》、司马彪的《续汉书》、无名氏的《曹瞒传》、无名氏的《英雄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袁献的《献帝春秋》、无名氏的《魏武故事》、皇甫谧的《逸士传》、张华的《博物志》、华峤的《汉书》、谢承的《后汉书》、干宝的《晋纪》、徐众的《三国译》、无名氏的《晋阳秋》、虞溥的《江表传》、王隐的《蜀记》、虞预的《晋书》、张隐的《文士传》、胡冲的《吴历》、无名氏的《华阳国志》、无名氏的《襄阳记》。

这些历史著述，对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60年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三国历史人物，都是以史学家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的，虽然其中不少事件和人物都富有故事性，而且有些颇富文学意味，但它们仍然被纳入“史学”的轨道，“三国”故事的流传还局限于历史系统，这就构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例如，《商芸小说》中的“蔡邕”条，便属于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说王允诛杀董卓以后，因他忌恨蔡邕，也将蔡邕收而杀之。当时太尉马日对王允说，蔡邕系海内人望，是旷世奇才，当定十志。王允就曾毫不客气地说：“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因此最后遂将蔡邕杀掉了。这件事可见《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四，它可能就是裴松之《三国志·董卓传》注中，所引谢承《后汉书》和张璠的《汉纪》中有关董卓事件的演绎，是紧紧围绕着历史事件而出现的故事。

远在魏晋时期，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就已开始传说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事了。南朝宋刘义庆在他的《世说新语》中，就开始采撷（Xié 音斜）了许多三国故事和佳话。

“三国”故事在历史系统流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魏晋时期在士大夫中清淡的风气风靡一时，除了崇尚老庄，高谈

玄理外，品评历史人物特别是三国人物，褒贬人物行为之得失，也是清谈的主要内容之一。王隐的《蜀记》记叙西晋初年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曾与其僚属刘宝、桓隰等人共论蜀相诸葛亮，在坐的多数人讥讽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而当时参与清谈的郭冲却独排众议，认为诸葛亮权智英略，当今无双，远逾管晏，只是最终因功业未济，才使论者产生了惑乱。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他列举了5件事：其一，诸葛亮实行严刑峻法正是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他认为诸葛亮之“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确为当时现实之所需。其二，曹操遣刺客欲杀刘备，刺客与刘备相对谈论伐魏，十分亲近，既而诸葛亮入，一见而知其为刺客，其明察如此。其三，诸葛亮遣诸军东下，惟留万人守阳平，其时魏司马懿20万大军逼近，蜀军将士失色，莫知所措，而诸葛亮镇静自若，从容设空城之妙计，使司马懿疑有伏兵，引军而北去。可证诸葛之智略。其四，诸葛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而降，围天水，拔翼城，收姜维，得百姓数千人还蜀，人以为喜，亮以为忧，认为“以此相智，得不为愧？”可见其志远虑深。其五，魏明帝以30万大军征蜀，诸葛亮以8万兵士守祁山，按蜀汉军事制度，适该轮换；亮以“大信为本”，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咸悦，留者愤踊，思致死命。临战之日，乃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司马懿，战而胜之，此信之由也。

对三国故事和人物的这种品评和褒贬，是三国历史故事得以流传的主要原因。上述诸葛亮的五件事，与其说它们是历史事件，不如说它们是历史故事更确切些。因为这些事件更具有文学的趣味，裴松之则对这五件事大加非难，认为未必有之，不承认这是信史，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其次，在汉魏六朝时期，轻视和贬低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这种情形依然十分严重。

人们视小说为“稗官”和“小道”，认为它是“街谈巷语”，“不本经传”和“背于儒术”，不登大雅之堂。这就使本来附着于历史之中的小说，更加难于存在和发展，人们也往往将小说当成历史来看待。

特别是三国历史又有《三国志》、《汉晋春秋》等影响极大的史书存在，所以三国故事在当时不可能脱离历史的轨道而单独流传。《三国志·诸葛恪传》曾记述诸葛恪少时四件事，颇具小说的韵味。一云孙权大会群臣，使之牵一驴，面上题曰诸葛子瑜，因恪父诸葛瑾（字子瑜）面长似驴，故而戏之。恪请补“之驴”二字，举坐欢笑，以驴赐恪。二云孙权问恪“卿父与叔父（指诸葛亮）孰贤？”恪对“臣父为优”。权问其故，恪云“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三云孙权命恪行酒，而张昭以“此非养老之礼”为由，拒而不饮，恪以为“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难之，使张昭竟无辞以对，只好一饮而尽。四云孙权戏谓蜀汉使者说诸葛恪雅好骑乘，请他叔父诸葛亮为致好马，恪即下谢，孙权感到十分诧异，问他：“马还没有送来，你却为什么马上就谢我呢？”恪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其才捷敏辩如此。这四件事既有历史人物又有故事情节，是小说家们的绝好材料，陈寿却把它写入了诸葛恪的传记之中，可见三国故事依附史传的情形。

到了隋唐时期，三国故事已开始逐渐地脱离了史传的轨迹，进入了流传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文学的阶段，并且通过话本系统和杂剧系统得到不断

丰富和完善。

我们先来看看在话本系统的流传情形。

说话人运用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来讲说三国故事，很早便已经存在。

隋炀帝时，有人将三国故事编成傀儡戏，如曹操谯（qiáo 瞧）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节目，在水上作杂戏表演。

唐人刘知己（661—721年）的《史通》卷五“采撰”中就有“诸葛犹存”一目，云“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中唐以后，三国故事已变成了说书艺术的重要素材，而且说得极其生动。晚唐有名的诗人李商隐在《骄儿诗》中描述了他的儿子摹仿说书人形容张飞和邓艾的神情、语态。

在唐代“说话人”口中，三国历史人物张飞的形象是个黑面孔，邓艾的形象特点是说话结巴。张、邓二人的形象，在史传中仅有点滴记叙，说张飞“雄壮威猛”，在当阳长坂之战中“据水断桥，瞋目横矛”，这或许就是“张飞胡”的由来。说邓艾“以口吃，不得作干佐”，这也是“邓艾吃”的由来。

但是唐代说话人对三国人物的艺术创造并不直接来源于历史，而是继承前代说话人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作的。

《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四引《语林》中《邓艾》条说：“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这段妙趣横生的简洁对白，是塑造邓艾形象的生动之笔。

到了北宋，讲说三国故事，已经被归入专门的名目之中，叫做“说古话”。

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戚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宋徽宗崇宁、大观前后，“说话”这种文艺形式发展到了盛况空前的程度。说话艺人之众多，从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分工之细密，都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叙了当时汴京的“说话”情形：“……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式亨、贾九讲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洋、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浑话。……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从这里关于“霍四究说三分”的记载看，说话人专说三国故事，已经成为一种专业，而且说“三分”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可能已将韩信、彭越、英布转世复仇的果报传说同三国故事联系在一起了。

元代至治（1321—1323年）年间，建安虞氏书坊所刊印发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集三国故事的话本系统之大成者。《全相三国志平话》共分上、中、下3卷，每卷23个题目，开头有一个“头回”，似为后来章回小说的“楔子”的前身，叙司马仲相冥间断狱故事。略谓汉光武帝时秀才司马仲相受天公之命，在冥间为君，断刘邦、吕雉屈斩韩信、彭越、英布一案。断明之后表闻天公，玉皇勅：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分蜀川为刘备，交英布为江东长沙为吴王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此书将整个三国故事，用这段公案巧妙地串结起来，前半以张飞为角色，后半以诸葛亮为角色，组合情节和结构故事，显得布局缜密，繁

而不乱，而且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拥刘贬曹”倾向。

《三国志平话》是形成《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话本系统的最高成就，已经初步具备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构布局、艺术造型和情节框架，它在《三国演义》的孕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具备了如下特点：

（一）、《三国志平话》虽然是依照历史的顺序展开情节的，但却较少史传的成分，有着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整个三国故事以黄巾起义为社会背景，用刘、关、张“桃园结义”作为开端，其间将“孔明下山”当成转机，而结于孔明“秋风五丈原”，展现了从魏、蜀、吴的崛起到鼎足而立，止于三国混一于晋的历史进程。《三国志平话》的创作者和润色者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史传的约束，把三国故事和人物加工成了符合“说话人”和“听话人”愿望的艺术品，历久不衰，更显光辉。

《三国志平话》中的人名、官名和《三国志》中的记载，很多都不相符。例如把关羽的封爵汉寿亭侯变为寿亭侯，把司徒王允、刺史丁建阳、侍中蔡邕都变成丞相，刘表为荆王，袁绍为冀王，诸如此类官名与史传不相符者还有很多。从地名看与史传相左者也为数众多，如曹操迁汉献帝于许都，却弄成了曹操迁都长安，把“华容”写作“滑荣”，“新野”写作“辛冶”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人名写错或写成同音字的情况很多，大多是以易认易记的常见字来代替史传中生僻古奥的人名，这是三国故事在群众中流传的产物。说明人们注重的不是三国人物在历史上的真实可靠性，而是三国故事的趣味性。

就故事的来源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言，《三国志平话》采自民间流传者较多，有不少内容同史传大相径庭。如刘备太行山落草、庞统变狗、曹操斩太子，曹操拜蒋干为师等等故事情节，都来自说话人的艺术创造，显示出民间文学的浓重色彩。

（二）、《三国志平话》具有较为谨严和完整的长篇结构，这在我国小说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形成也具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的艺术结构的基本特点是链条式的复线结构，即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呈现出波连浪涌，一泻千里的壮观。

话本以汉末黄巾起义始，引出桃园结义，渐入群雄混战，赤壁一战，魏、蜀、吴三国鼎立，此后则有诸葛亮南征“七擒七纵”及“六出祁山”。这些大体上并未违背历史的真实。而这些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话本却是以人物之间的关系为契机，简洁然而巧妙地进行过渡和转折。话本的前33个题目以张飞为主线，后36个题目则以诸葛亮为主线，把人物和事件进行链锁式的组合，层次比较清楚。

（三）、从思想内容看，《三国志平话》有鲜明的“拥刘贬曹”倾向。

作者以蜀汉一方和张飞、诸葛亮作为描写的重心，同时用基本上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道德标准来塑造人物形象，褒贬人物，表现自己的好恶感情。

《三国志平话》以充沛的热情，描写了刘备、关羽、张飞“同生共死”的兄弟义气，渲染了刘备仁德爱民的圣君气度，赞颂了诸葛亮足智多谋和忠诚不渝的贤相品质，这些善和美的道德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会圣君贤相的某些本质特征和社会意义，具有自己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时，由于艺术结构的需要，作者是把曹操作为圣君贤相的对立人物加以描写的，并且份量也不占主导地位。将丑与恶的道德属性赋予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暴君奸相的某些本质特征和社会意义，同样也具有自己的

审美价值，表现出人民群众的好恶感情和褒贬色彩。

现在我们来谈谈在杂剧系统的流传情况。

把三国人物故事搬上舞台变成戏剧，早在隋朝就已经开始了。

据《大业拾遗记》中的《水饰图经》所述，隋炀帝敕学士杜修宝修《水饰图经》15卷，书成之后，三月三日上巳节在曲江池大会群臣观看“水饰”，共演“七十二”势，从戏的名目看，属于三国故事的共有五出，即《曹瞒沿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杜预造河桥成，晋武帝临会，举酒劝预》、《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

唐代表演三国故事的戏剧更多，扮像已开始定型化。

宋金时代，无论宫廷和民间，戏剧已经是人们普遍喜爱的一种文艺形式，当时的“宋金杂剧院本”有不少是表演三国故事的。

陶宋仪《辍耕曲录》所记的剧目中，有《刺董卓》、《蔡伯喈》、《襄阳会》、《骂吕布》、《大刘备》、《赤壁鏖兵》等6种。

到了元代，杂剧成为一代文学的主流，故事题材又相对集中，而三国故事也便成为很重要的一个类别。

从《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元曲选》卷首剧目以及王国维的《曲录》等书中，记载着三国故事的杂剧大约60种，其中现存的21种，已失散的有39种。

现存的21种为《关大王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醉思乡王粲登楼》、《虎牢关三战吕布》、《刘玄德醉走黄鹤楼》、《诸葛亮火烧博望屯》、《锦云堂美女连环记》、《关云长千里独行》、《两军隔江斗智》、《刘关张桃园结义》、《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张翼德大破杏林庄》、《张翼德单战吕布》、《张翼德三出小沛》、《莽张飞大闹石榴园》、《楚凤雏庞掠四郡》、《曹操夜走陈仓路》、《阳平关五马破曹》、《寿亭侯怒斩关平》、《周公瑾得志娶小乔》。

已佚失的为《诸葛亮军屯五丈原》、《七星坛诸葛祭风》、《徐夫人雪恨万花堂》、《终南山管宁割席》、《曹子建七步成章》、《作宾客陆绩怀桔》、《相府院曹勣吉平》、《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周瑜谒鲁肃》、《虎牢关三战吕布》、《白门斩吕布》、《东吴小乔哭周瑜》、《受顾命诸葛亮论功》、《蔡琰还朝》、《卧龙岗》、《诸葛亮挂印气张飞》、《关大王月下斩貂蝉》、《诸葛亮面伏陆逊》、《寿亭侯五关斩将》、《老陶谦三让徐州》、《关云长古城聚义》、《宋伯通衣锦还乡》、《斩蔡阳》、《关云长义勇辞金》、《十样锦诸葛论功》、《诸葛亮火烧战船》、《刘玄德私出东吴国》、《马孟起奋起大报仇》、《赵子龙大闹塔泥镇》、《范疆帐下斩张飞》、《张翼德力扶雷安天》、《董卓戏貂蝉》、《左慈飞杯》、《破黄巾》。

从上列60种三国故事的剧目来看，除了《莽张飞大闹石榴园》、《寿亭侯怒斩关平》、《东吴小乔哭周瑜》、《关大王三捉红衣怪》、《诸葛亮挂印气张飞》、《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及《宋伯通衣锦还乡》等7个剧目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情节、人物无关外，其余53个剧目显示了从历史到长篇小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转变，即创作方法的成熟，以及情节、人物的形象化。

以上我们所谈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一种历史演义小说，它有着特殊的渊远流长的成书过程。它的素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史籍，二是民间传说，讲史话本和戏曲，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罗贯中正是根据这些素材

进行长期的加工提炼，最后才写出这样一部令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长篇历史小说的。

总之，我国著名的古典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以丰富、浩瀚的三国历史资料为素材的史诗般的伟大作品。它的诞生，不仅是最后加工提炼创作成书的我国中世纪的艺术大师罗贯中的辛勤建树，而且也是包括了三国以后历代创作三国故事的古小说作者、民间艺人、剧作家以及历史学家们共同创造的文学过程。它是作家的才华和人民群众的智慧相结合的典范。这样一部作品，几百年来，它差不多被整个民族一代接一代地不停阅读，这对于促进我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塑造、民族精神的高涨，都起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

